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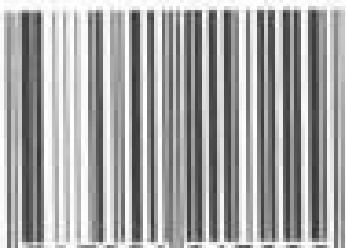
(巴西)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 恩佐·法勒托 著



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

世界知识出版社

ISBN 7-5012-1722-X



9 787501 217229 >



ISBN7-5012-1722-X/F·86

定价：20.00元

拉美的依附性 及发展

[巴西]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著
恩佐·法勒托

单 楚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七月三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 / (巴西)卡多佐, (巴西)法勒托著; 单楚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5

ISBN 7-5012-1722-X

I. 拉… II. ①卡…②法…③单… III. ①经济-概况-拉丁美洲②经济发展-研究-拉丁美洲 IV. F17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8993 号
图字:01-2002-0383

责任编辑 郑志国 程立
封面设计 段来和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张 娟

书 名 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010) 65265923
邮政编码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印张 880×1230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100 千字 4 插页
印 数 1—2000
版次印次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卡多佐总统中文版序言

今天，作为共和国总统，当我为这本与恩佐·法勒托于35年前共同完成的著作撰写序言时，一种陌生而奇特的感觉油然而生。

陌生的感觉是因为，我必须承认国际生产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尽管如此，在每一个国家，这本书都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婴儿面孔”的形象。虽然它已不再被视作“新思维”或者“开创性”著作，然而就其所开辟的视野而言，它仍然保存着相当的新鲜气息。

奇特的感觉是因为，今天我是以政策制定者的身份而不是以学者的身



份来面对书中所描述的种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可以用自己的实践来验证在如此长久以前书中所作的一些假设和建议的价值和局限性。而令我欣慰的是，尽管当时我毫无作为一名“国家领袖”或“政治人物”的经验，但我们在书中作出的诠释并没有出现很多错误。

或许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没有向历史关闭大门，也没有试图勾画出“惟一的道路”。在为奇迹预留下空间和摒弃“经济至上”的伪客观主义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否定各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局限性。与那种简单化的否定相反，本书提出将政治要素融合进来，并视之为未来道路中的关键因素。因而，本书对拉丁美洲在那一时期表现出的活力所作的诠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从写这本书的时代到现在，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许这段时间正是当代史上变化最为显著的时期。略举几例，就可以使人深切地感受到这段时间所特有的近乎“狂热”的气息。

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标志着一个对中央计划经济和一党专制抱有巨大希望的时代 的结束。

相对而言，拉丁美洲学会了如何调整自身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古巴也在新时代中生存下来，尽管有美国的制裁（或许正是因为



它), 菲德尔史诗继续将古巴人民团结在一起, 并给第三世界带来希望之光。

在全球化的现阶段, 欧盟成为制衡美国霸权的一支重要力量。日本本可成为另外一支有利于建立多极化体系的潜在力量, 可惜其经济迄今仍处于停滞状态。

但毫无疑问, 还有新的“新兴经济”, 其中就包括巴西经济。巴西在美洲地区扮演着一个活跃的角色, 而其他具有毋庸置疑的国际影响力的新兴国家都应该不断地融汇到巴西的声音中来。

然而, 另一方面, 国际新秩序也面临着明显的挑战, 如贫困的挑战和由于原教旨主义的复活而形成的挑战。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全球化市场的边缘, 并面临着诸多问题, 而外部世界却对此漠视不理。需要指出的是, 关于原教旨主义这一宗教问题, 它已影响到了历史截然不同的各个国家, 如阿富汗、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甚至前南斯拉夫。

此外, 如果说在遥远的 20 世纪 60 年代末, 专业术语中还不存在“跨国”这个词的话, 那么“全球化”一词如今则已耳熟能详,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 跨国集团比某些民族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力。

最重要的是, 数字化技术革命和便捷安全的传输技术已将大部分国家的生产市场融合在一起, 并使得金融市场之间相互交错, 财富亦被虚拟化了。

随着因特网和卫星天线所带来的革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超越了国与国之间的疆界。

但是，与这一切不相符的是并未建立一套基于民主标准之上的国际政治体系。经济可以实现全球化，但权力却仍然在某一极企图建立霸权而众多国家不愿屈从于一个不对称的世界秩序的矛盾中挣扎。政治已越来越不仅仅是经济霸权的扩张，历史也不仅仅由一种思想来概括。对各民族之间团结和消除社会不公及贫困的呼唤，要求实行一种如法国人所说的“带有人文色彩的全球化”。

应该从这一角度来阅读此书，即把它作为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及其历史局限性的见证。本书尽管只涉及拉丁美洲地区，但对于正在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的中国人民来说，它仍是值得一读的。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在我们撰写本书的年代尚未出现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组成地区性集团，以更好地在不对称的全球化环境中求得生存。南共市（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些美洲区域组织，其目的正是在于尝试如何在美国的明显优势面前团结起来而不是相互分散。

上述现象，以及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再加上中国、印度、南部非洲发展与协调会议（即现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译者注）以及其他众多的地区性组织，是一份关于建立一种更为民主的世界秩序的宣言，抑或仅仅是面对强者而采取的自卫行动呢？

只有国家及其代表的具体斗争才能作出回答。但挑战在于，如何将世界权力组织起来，使得全球化产生的生产力能够成为争取自由和福祉的工具，而不仅仅是可能带来“恐怖新世界”的威胁。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二〇〇一年五月于巴西利亚

前 言



1966年至1967年间，本书作者与一批经济学家和规划学家在一所国际性教学、研究与规划机构中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本书正是在此期间于圣地亚哥完成的。其目的是为了就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问题同经济学家们建立对话，以突出强调这一发展过程的社会及政治性质。可以肯定，没有人会怀疑这一观点。问题在于，怎样才能用一种更加直接和准确的方法来揭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结合方式，以及三者间的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结构条件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本书中某些章节的具体内容可能会超越这一有限的目的，然而全书的讨论背景将始终不变。作者不敢奢求本书能够涉及经济发展中所有主要的问题以及它与其他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同时，为了突出本地区各国社会变革进程的类型和差异，本书未讨论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如奴隶制问题、印第安人的生存问题以及欧洲移民的重要性等问题。

更为审慎地说，本书旨在阐述既依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权力量又向往着主权的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条件、可能性及发展模式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另一方面，本书也试图含蓄地指出，在不指明结构和历史差异的情况下去谈论拉丁美洲，会臆造出一个有切实危险后果的错误理论。

目 录

卡多佐总统中文版序言 / 5
前 言 / 11

第一章 导言 / 1

第二章 对发展的全面分 析 / 10

第一节 分类分析：传统社会和
现代社会 / 11

第二节 社会变革的思想 / 14

第三节 结构与进程：相互间的
作用 / 17

第四节 欠发展、边缘和依
附 / 21

第五节 “国家的欠发展” / 28

第六节 民族经济与世界市场的
联系类型 / 33

第七节 对发展全面分析的展望 / 36

第三章 “对外扩张”时期的基本情况 / 39

第一节 国家对生产体系的控制 / 43

第二节 飞地经济 / 48

第四章 转型时期的发展和社会变化 / 55

第一节 生产由国家控制的社会转型时期 / 58

1. 中产阶级参与出口资产阶级权力体系 (阿根廷) / 67
2. “传统”中产阶级的参与及寡头—资产阶级的统治危机 (巴西) / 70
3. 中产阶级参与权力联盟 (乌拉圭) / 75
4. 寡头的主导地位和中产阶级的脆弱性 (哥伦比亚) / 77



5. 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工业化 / 80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飞地经济 / 84

1. 中产阶级在寡头统治的衰落中参与权力体系（墨西哥、玻利维亚、委内瑞拉） / 88
2. 中产阶级参与寡头—资产阶级统治体系（智利、秘鲁） / 93
3. 面对大庄园主和飞地的中产阶级（中美洲） / 99
4. 中产阶级、工业化和相关政策 / 102

第五章 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国内市场巩固阶段的社会力量和发展主义政策 / 106

第一节 民众主义和自由企业经济 / 114

第二节 民众主义和国家的发展 / 121



第三节	发展主义国家 / 128
1.	墨西哥的工业化进程 / 129
2.	智利的工业化进程 / 131
第六章	市场国际化：依附的新特点 / 135
第一节	民族工业化进程的结构 性制约 / 136
第二节	国内市场对国外控制的 开放 / 146
第三节	依附与发展 / 149
结 论	/ 167



第一章 导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似乎已经具备了建立自身工业体系并启动可保障自给型发展的经济转型的条件。的确，在经历了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生产和市场重组之后，由于外汇的大量积累，以及国内市场面对战争所采取的自卫性措施，拉美某些经济似乎已经具备了各种条件，来完成所谓的“进口替代”过程，并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资本货生产，以最终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似乎足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同时，劳动力从主要集中在乡村的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也会成为扩大市场的因素之一。之后，大约在1955年，人们认为要保证经济发展，就必须具备一个新的发展要素，即利润的再分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似乎已构成了必要条件，以确保经济从某一特定时期开始，在简单的市场刺激下实现自发性增长。

经济形势有力地支持了这种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拉美一些最重要的经济专著也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由此，那种认为“工业化是对以初级产品出口为基础的发展过程的一种补充手段，也是在国际市场收缩时期的一种无奈之举”^①的观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均为另一套理论体系和憧憬所取代。后者坚信工业主义将伴随着出口扩张而出现，并由此实现经济增长和开启一个自给型增长的新阶段；同时，它还认为这一新的阶段应当建立在刺激内需和实现工业生产体系分工的基础上，而工业生产体系的分工将创建一个本国资本货工业体系。

但为了保证商品出口以及获得外部投资，同国际市场的联系还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内部市场的扩张将足以保障持续的经济发展。扶植“出口工业”对保持“进口能力”也继续有其必要性，但经济发展的重心将不再是国外市场，而是国内市场。

^① 关于有必要通过工业化来带动出口领域的经济增长，使其作为一种解决由世界市场不景气而引发的问题的手段这一点，可以参阅劳尔·普雷布什所著《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一文，《拉丁美洲经济公报》（1962年）第7卷，第1～24页。



不可否认的是，在 50 年代（指 20 世纪 50 年代，下同——译者）初期，起码在诸如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已经具备了实践拉丁美洲这一新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些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是：

（一）拥有一个足以消化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而从上个世纪（指 19 世纪——译者）开始，伴随着农畜牧业型和矿业型经济融入世界市场，这种国内市场就已开始形成；

（二）近 80 年来逐渐形成的工业基础，既包括消费型轻工业（食品、纺织等等），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出口经济的相关产业；

（三）拥有在农业、畜牧业发展和矿产开发中获得的丰厚外汇资源；

（四）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哥伦比亚等国，从 50 年代后半期开始，其外贸持续增强，有力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五）某些国家，比如阿根廷^①，其本国资本在资本总量中的比例相当高。

由此，从经济观点来看，似乎所有的经济发展

^① 关于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条件，可参阅本杰明·霍本哈亚所著《停滞与不稳定：强制替代进口阶段的阿根廷》一文，《经济季刊》（1965 年 1—3 月）第 125 期，第 126—139 页。

政策都应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引进技术，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和提高生产力；

（二）制订一项投资政策，以便国家致力于进行产业结构多样化所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①。


从那时起，结构性条件以及有利的经济形势使得经济学家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拉美经济的发展将主要取决于各国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经济政策的能力。

经历了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拉美国家，甚至诸如阿根廷这样有着“自由”经济传统的国家纷纷开始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捍卫本国出口经济的发展。此后，各国又致力于创建各种公共机构，以根据新的政策方针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并相应调整国家官僚体系内决策者们的目标和行为。

国家职能的强化和现代化似乎是制定一项切实高效的发展政策所必不可少的。这使得拉美的经济学家们不得不一再强调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并回到“政治经济”这一概念上来。

这一概念隐藏的含义是，拉美的历史基础决定

^① 另一种选择可以是在初级生产方面增加居民收入以便弥补兑换条件恶化的趋势。此点可参阅普雷布什所著《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一文，尤其是第 6 页的内容。



了一种明显带有国家特性的发展模式。这就意味着各国要加强内部市场，同时建立国家决策中心，以便能够及时应对各自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这一乐观的看法从 50 年代末开始逐渐销声匿迹。在具备众多明显有利条件（即具备了有利于从进口替代阶段向一个能拓展新的、面向国内市场的自主生产领域阶段过渡的条件）的情况下，很难解释为什么没有制定一些必要的措施来保持经济发展的延续性，或者为什么制定了措施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应该说，在现代化领域所采用的先进科学技术是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之一。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在某些情况下，先进技术的引入使减少使用劳动力成为可能，而经济的增长率不足以抵消这一负面影响，也未能消化因人口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压力，因此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达到能够带动最落后领域发展的程度。同时，由于并非所有的困难都明显地表现为经济萧条，而萧条的后果也不会马上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对现有经济发展政策并不是非调整不可。

换言之，如果说诸如阿根廷这样本地区最繁荣国家所具备的经济条件也只是保证了其经济发展仅延续到 50 年代中期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由于缺乏各种社会和机制化条件，无法促便有利的经济条件转化为可以保障经济发展的政策呢？还是因

为实际上存在一个认识误区，从而导致人们信奉了一种在经济上根本行不通的发展模式呢？

在某些国家，尤其是 50 年代的巴西，人们根据事实推测，对一种自足和自主型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所寄予的希望并非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进口替代进程的发展使经济逐渐进入了一个资本货生产阶段，而这一阶段由于其自身特点，似乎导致了一个新的、不可逆转的巴西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这是因为资本货生产所带来的多重效应往往会产生强大的经济推动力。除此以外，这种工业有别于仅存在消费品生产的工业，它在经济危机期间并不会轻易地引发工业的再次转型或导致自身的消亡。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也不能使人产生像前面所说的那种乐观情绪。因为在进口替代所产生的经济高潮过后，60 年代出现了一段经济相对停滞的时期，而巴西经济现仍处于这一停滞时期所导致的经济低迷之中^①。

在三个工业化进程最为显著的国家中，仅有一个国家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保持了可观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是墨西哥。尽管应该承认这是因为墨经济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巴西替代出口过程的兴衰”一文，《拉丁美洲经济公报》1964 年第 4 期，第 1～62 页。与此同时，从经济角度而言，巴西经济的特点似乎也表明这仍是一种同“发展”情况有关的现象。




结构，尤其是其对外出口的多样性使其有别于拉美其他国家，但利润分配的极度不平等和日益增长的外资对经济的参与，仍可以被视为是可能改变经济学家们关于自主自足型经济发展模式种种假设条件的因素。

初涉此问题，我们有一种看法，认为那些 40 年代末形成的、建立在纯经济因素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和预测并不足以解释后来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在阿根廷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可以实现的经济飞跃并没有出现，甚至连所希望的质变也没有发生。尽管在 50 年代经济发展的动力下，巴西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可以通过短期外部财援得到暂时解决，但就在人们宣布已经彻底排除了经济发展中的障碍时^①，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的阶段却又开始了。而墨西哥经济在民族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在经历了深刻的调整和转变的阵痛后，似乎有了大规模扩张的可能，这要归功于通过外资输入和外贸多元化所实现的与世界市场的融合，其中，旅游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不禁要提出以下这些问题：为什么诸如阿根廷这样曾展现出大好发展前景

^① 参阅塞尔索·富勒塔图所著《发展与欠发展》，尤其是其中的第 5 章，里约热内卢文化基金出版社，1961 年出版。



的国家，其民族经济仍存在着活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即使像墨西哥革命这样打破了各种社会力量平衡的事件也没有从根本上推动经济的发展？巴西社会结构因素以及“发展主义”时期的政治、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难道不是导致巴西良好的经济局面形成，而后再导致其经济动力在经历了发展过程之后迅速消失的原因吗？

然西，仅用事实的负面轨迹来印证经济预测中存在不足之处，从而得出必须用社会学观点来取代经济学角度的解释的结论未免过于肤浅。在经济方面，人们继续对产品出口推有乐观预期，这往往制约了拉美经济的发展。在朝鲜战争打响之后，恰恰就是那些良好的外贸条件受战争的直接影响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对外交换条件不断恶化为特点的明显不利的经济局面，随之外贸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采取了一些弥补措施，或者通过将国外融资所得向公共部门进行直接投资，或者通过价格稳定政策等方法对本国的国际合作进行了调整，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对经济发展起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其原因可部分归结为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在某些国家，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够对生产体系进行重组，但无论是社会体系还是政治体系都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重组。这一现象促使人们认识到，



尽管“传统社会”的经济面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但它的一些利益集团仍然没有丧失对权力体系的控制^①，虽然这些利益集团不得不同新兴集团一起建立一个复合型的联盟体系。这样，随着5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增长减缓，由新的社会主角或仍由那些老主角统治的美洲大陆的老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新的面目出现的。

尽管本地区各国间社会结构的差异以不同方式影响了经济增长，但仅用“社会学”分析来取代“经济学”解释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分析，它不仅能够更加全面和准确地回答有关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或停滞的可能性这一总的问题，同时也能够回答经济走向及其政治、社会条件等决定性问题。

^① 可参阅拉美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战后社会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索拉尔/哈切特出版社，1963年出版。其中提及传统势力灵活性的可能。

中间或复合型社会，它具有“发展中”国家社会的特征。如果没有形成这一复合型社会，那么就会导致在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领域和其他仍保持传统面貌的社会领域之间形成停滞的局面。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二元体系”^①的概念。事实上，这只是对古老的“团体—社会”二元论的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

我们似乎可以从下面两方面来驳斥这种分析方法。一方面，“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概念无法充分而准确地涵盖目前所有的社会情况，它们既不能区分决定被分析社会存在形式的结构成分，也不能揭示其运作和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这种分析方法也无法在诸如欠发展、通过出口谋求发展或进口替代等不同经济阶段之间，以及“传统”与“现代”社会等不同社会体系之间建立简单明了的相互联系。

为了进一步阐述以上观点，假设通过发展进程不同阶段的具体方式可以推理出上述社会类型的某些特性，但即使是这样也还不可能解释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过渡的模式。事实上，社会结构的变化

^① 此处的“体系二元主义”可见雅各·兰伯特：《巴西：社会体系和政治机构》，巴黎，1953年出版；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斯曼：《经济发展战略》，耶鲁大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中间或复合型社会，它具有“发展中”国家社会的特征。如果没有形成这一复合型社会，那么就会导致在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领域和其他仍保持传统面貌的社会领域之间形成停滞的局面。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二元体系”^①的概念。事实上，这只是对古老的“团体—社会”二元论的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

我们似乎可以从下面两方面来驳斥这种分析方法。一方面，“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概念无法充分而准确地涵盖目前所有的社会情况，它们既不能区分决定被分析社会存在形式的结构成分，也不能揭示其运作和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这种分析方法也无法在诸如欠发展、通过出口谋求发展或进口替代等不同经济阶段之间，以及“传统”与“现代”社会等不同社会体系之间建立简单明了的相互联系。

为了进一步阐述以上观点，假设通过发展进程不同阶段的具体方式可以推理出上述社会类型的某些特性，但即使是这样也还不可能解释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过渡的模式。事实上，社会结构的变化

^① 此处的“体系二元主义”可见雅各·兰伯特：《巴西：社会体系和政治机构》，巴黎，1953年出版；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斯曼：《经济发展战略》，耶鲁大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中间或复合型社会，它具有“发展中”国家社会的特征。如果没有形成这一复合型社会，那么就会导致在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领域和其他仍保持传统面貌的社会领域之间形成停滞的局面。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二元体系”^①的概念。事实上，这只是对古老的“团体—社会”二元论的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

我们似乎可以从下面两方面来驳斥这种分析方法。一方面，“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概念无法充分而准确地涵盖目前所有的社会情况，它们既不能区分决定被分析社会存在形式的结构成分，也不能揭示其运作和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这种分析方法也无法在诸如欠发展、通过出口谋求发展或进口替代等不同经济阶段之间，以及“传统”与“现代”社会等不同社会体系之间建立简单明了的相互联系。

为了进一步阐述以上观点，假设通过发展进程不同阶段的具体方式可以推理出上述社会类型的某些特性，但即使是这样也还不可能解释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过渡的模式。事实上，社会结构的变化

^① 此处的“体系二元主义”可见雅各·兰伯特：《巴西：社会体系和政治机构》，巴黎，1953年出版；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斯曼：《经济发展战略》，耶鲁大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绝不仅是一个将结构布局^①中新的“变量”简单相加的过程，它意味着各种社会集团、力量和阶级间关系的演变，其中一些（集团、力量和阶级）试图通过社会结构的变化将其自身的统治方式强加到整个社会。

在纯经济领域，可以通过研究决定经济的分化过程的变量及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某一生产领域的发展水平。在这一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尤其是考虑到收入分配和就业结构，就可以推理出社会结构的组成方式。

不过，当把纯经济的分析与对政治、社会发展的分析结合在一起时，需要回答的就不仅仅是某一个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了，还应主要包括这个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试图维持或改变该社会的社会力量的主导思想和行为方式，以及涉及国内外各集团间平衡的所有政治和社会因素等问题。

此外，当人们仅局限于在发展与现代社会、欠发展与传统社会之间建立一种笼统的联系时，对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分析就显得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正如本书后简的相关章节将要阐述的那样，如果假设发达社会的统治将“传统集团”排除在外，那么发展与现代化之间就未必会有什么关系。

^① 见彼得·海因斯所著《对拉美国家的整体分析》一文。



比如，某个社会在消费、教育等方面实现了现代化，但其依附程度并未减小，且其经济体系也并没有从边缘向中心迈进。

第二节 社会变革的思想

我们不仅可以用专业术语分析和解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等概念的内涵，还可以概括地谈一谈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过程。

当人们尝试说明这些概念时，几乎总是存在一个方法论上的前提，即西欧国家和美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预示了欠发展国家的未来。“发展的过程”就是完成甚至简单重复欧美国家社会变革特有的各个阶段的过程^①。因此，历史的差别，即每个欠发展国家所处的具体环境的特性对这种社会学来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不过，这种方法论显然也没有天真到认为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发达国家的历史仅存在着简单的时间上的差别，使人们以为同发达国家相比，拉丁美洲

^① 见罗斯陶所著《经济增长的各阶段，非共产主义的表现》，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韦尔伯·摩尔《经济与社会》，纽约双日公司，1955年出版；科尔、唐洛普等合著《工业化与工业人》，伦敦海恩曼，1962年出版。




还停留在 19 世纪。欠发展国家一个经常被提到的特性就是它们的体系仅在某些方面是落后的，其余方面则不然。比如说，工会组织在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已是全国性的组织，它可以对本国有关工资水平的决策施加影响，这在“发展原型”国家也不多见。同时，拉美加速发展的城市化比工业化还早，使得建立在国内市场基础上的自主型经济发展开始之前，那些有利于民众更多地参与权力游戏的愿望和政治行为方式就已传播开来。这些观点强调，民众对消费决策的影响决定了在拉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早熟”现象。

人们认为，这种主要是社会领域的、大致与中心国家相似的参与水平或许能起到桥梁作用，使发达社会和欠发展社会在社会状况和价值取向方面趋同。这就粗略地构成了习惯上所称的“演示效应”。

在经济分析层面，“演示效应”论认为经济现代化是通过消费来实现的，这样，消费最终可能导致生产体系偏离先进国家特有的工业化“阶段”。比如，在自主型经济发展中，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储蓄，而消费现代化的压力却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因为它在有利于消费品进口的同时，也有利于生产这些消费品的资本货的进口，从而导致对非基础经济领域的投资增加。

另一方面，不能仅从经济层面来看待“演示效



应”。比如，在不够发达的国家中，有利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在生产体系全面变革之前，已经迫使人们的行为在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发生了变化，那么就可以强调，“演示效应”至少在拉美是在有利于它的特定社会条件下发生的，意即是在拥有“民众存在”的条件下和人民有了最起码的政治参与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可见，社会学分析能够解释社会条件并非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因素，从而使人们明白，欠发展社会的活力并非仅来自外部因素，其自身的特殊体系及其中的各社会集团和机构的活动也起着实际的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着重分析拉美的特定社会条件以及各阶级和集团的社会一体化类型，并视之为影响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才是一种更加合适的分析方法。从这一角度出发，“演示效应”只是分析中的一个次要因素，最基本的是在于研究国家范围内不同社会集团间关系的模式，而这取决于各社会集团与经济体系以及那些可能对欠发展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国际政治集团相联系的方式。

这样，不仅要指出“演示效应”或其他外部变量对一国经济体系的运行或“现代化”社会集团的行为所起到的作用，还应强调其历史结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导致了与发达国家类似的现代化进程，并可能揭示这种现代化的意义所在。



第三节 结构与进程：相互间的作用

为全面地分析发展，仅仅认识到“社会因素”是结构性制约条件或新的结构性变量是不够的，还需在下面两个方面调整思考角度：首先，要从整体上考虑发展进程中，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经济、社会“特定历史条件”；其次，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去了解和认识哪些利害冲突产生、指导或激化了各社会集团和阶级间的矛盾，以及那些使欠发展社会“迈上发展之路”的社会运动。因此，最根本的是要在强调具体的结构性条件，并突出社会运动的宗旨、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动向的同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分析。

接下来要找到一个联接点，使我们在分析社会集团的行为时，不是将发展过程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简单地叠加，而是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要求分析必须超越所谓的结构重点论观点，并与“历史进程”论相吻合。这里所指的“历史进程”论，并非指那些天真地强调时间顺序的重要性、要求对每个社会情况的起源和发展都作出解释的观点，而是指历史的变迁只能用赋予历史事实以内涵并因此而载入史册的因素来解释。这样，发展就成为各社



会集团和社会阶级互动的结果，在它们之间有着特定的关系、不同的物质利益和价值；它们之间的对抗、和解或征服行为为社会经济体系注入了活力。随着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将它们的利益、能量和统治强加到整个社会，社会与政治的结构也在不断地改变。

通过对那些正在或可能指导行动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分析，变革进程不再表现为独立于历史条件之外的“自然”因素的结果，而开始表现为具有不同社会、政治利益和指导思想的集团在发生摩擦时，如何在纯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克服矛盾的过程^①。

为了对这一日益广泛而复杂的问题进行理论研究，需要寻找反映历史进程的不同时期和结构特征的因素，它们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对发展均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前面所讲的这种研究方式，基本的理论问题在于确定统治体系的结构模式，因为只有通过它才能理解阶级关系的活力。同时，也只有通过对统治结构的分析才能正确理解某一特定时期政治团体的组成和政治秩序的变化过程。这种理论选择的事实依据是，拉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性变革一直都伴随着，如果不是统治结构的激变，

^① 这种观点的分析可见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所著《工业企业家和经济发展》第1、2章，欧洲传播出版社，1964年出版。



至少也是各阶级和集团的关系和斗争的新模式的出现。因此，对拉美国家的统治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即意味着必须将内部和外部决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但这种联系决不应被理解为是一种“偶然性和分析性”的联系，更不应被视为是一种机械而迅速地由外向内的作用。后面的章节将谈到的依附的概念正是试图将一连串在某一时期同时出现的事实和情况串联起来，并通过这种串联尝试在内部和外部结构间建立一种有机联系。同时，依附论认为，外部因素也影响着欠发展国家各集团和社会阶级间特定的关系模式。正因如此，才有必要着重分析依附在国内的表现，因为依附的概念是“重大偶然性”观点的典型例子，它认为特定历史关系形式决定一切，而与之相对的纯粹“机械偶然性”观点则强调外部因素对内部“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

由于本书旨在同时解释经济进程和社会进程，因此需要找到一个理论结合点，其中经济权力表现为社会统治，即政治。这是因为，一方面，一个经济阶层或集团毕竟是通过政治过程来尝试建立一种社会关系，从而将其特有的生产方式强加于整个社会的；另一方面，这一经济阶层或集团也可能尝试与其他集团或阶层建立联盟或从属关系，以利于其按照自身利益和目标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模式。因此，经济关系的类型决定了政治活动的范围。



下面是一些表现最为活跃的问题：世界市场的经济制约因素，包括国际间的权力平衡；国家生产体系的结构及其与国外市场的联系类型；社会的历史结构面貌；分配和保持社会权力的方式，尤其是导致变革的社会政治运动及其宗旨和目标。直接分析欠发展国家或发展中社会的主要因素、进程和运动是一项艰巨而又无止境的任务。不过，确定并研究一些对理解发展的潜力具有基本意义的问题却是可行的，哪怕有些问题有其特殊性，也能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从而有助于认识整个欠发展社会的情况。选择有关发展的问题或条件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前述的综合性分析。因此，必须找到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交汇集合，以揭示出确实影响发展潜力的不同社会阶层和领域之间的联系和活力。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对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控制问题构成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发展的主轴。事实上，社会学对经济变革过程的诠释，正是在分析了危及经济和政治结构基础的社会集团和阶级间的矛盾后得出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或许应该对目前十分流行的“决策机制”进行分析。不过，如前所述，发展这一社会学问题远不仅限于此，还必须对统治结构和各社会阶层（因为它们对每一特定经济体系的决策



和控制机制及类型都起着制约作用), 以及统治阶级或集团和与之确实或潜在对立的其他社会阶级或集团之间的政治行为进行研究。此外, 还需考虑到可能对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价值取向问题。

对这些政治运动和政治力量的理解构成了对发展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组成部分, 而发展本身又常常导致社会统治体系的改变, 并使生产与消费的控制体系和组织方式发生重组。

第四节 欠发展、边缘和依附

为了从经济分析或通常的社会学解释过渡到对发展的全面阐述, 有必要从头开始研究欠发展社会的经济体系与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这些关联不仅指欠发展社会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联系, 还包括它们与发达社会之间的关系, 因为欠发展社会的历史独特性恰恰诞生于“边缘”社会与“中心”社会的关系中。因此, 考虑到“欠发展”所特有的历史意义, 需要重新定义“欠发展境遇”, 并对将之视为一种可能导致某种秩序“模式”的社会及经济变量的分析方法提出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 首先要将“欠发展”国家从“不发展”国家中剥离出来, 然后根据每个欠发展国家与各政治、经



济霸权中心间的特定关系区分其不同的类型。就本书的目的而言，只需指出欠发展和“不发展”这两个概念间的区别在于，不发展是指那些日益减少的、与工业化国家没有市场关系的经济和人民的处境。

至于欠发展，世界生产体系的历史形成过程为它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即在某些情况下，边缘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表现为“殖民化”的形式；在另一些情况下，边缘经济产生于“国家社会”中。对后一种情况可以补充说，在某些情况下发达的统治中心与国家社会中的边缘国家也有联系；与此同时，有一些殖民地虽已转变成为国家，但仍处于欠发展状态。

总而言之，欠发展状况在历史上产生于商业资本主义及以后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其间，这些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将不同的经济体联系在一起，这些经济体不仅表现出不同水平的产业体系，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也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这样一来，发达经济和欠发展经济的不同不仅表现为一种简单的发展阶段或生产体系上的差异，也表现为在统一的生产和分配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或位置有所不同。这就注定了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体系。这样，正如通常所说，欠发展这一概念更多地反映出这样一类经济体系，其中初级产品生产占




主导地位，收入高度集中，产业体系单一，尤其是外部市场对内部市场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仅有这些特征显然是不够的。

为了充分认识欠发展状态所具有的历史特性，就要求不仅只对欠发展经济的结构特性进行分析，还必须分析欠发展经济在历史上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以及曾成功制定欠发展条件下的外向型政策的国内社会集团的形成方式。这种分析方法意味着应该承认欠发展社会在社会政治范围内存在着某种类型的依附。从历史上看，这种依附是随着资本主义起源国家的经济扩张而开始的。

欠发展情况下的依附在社会领域内意味着一种统治形式，它通过在经济体系中以生产者或消费者出现的各集团的行为模式及指导方针等一系列特点而表现出来。这种情形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意味着那些影响某一特定经济的生产或消费的决策是根据发达经济的活力和利益来制定的。建立在殖民飞地之上的经济就是这种根端情况的典型例子。

在这一论证面前，“中央经济”和“边缘经济”的说法可能比发达经济和欠发展经济的提法显得更富社会内涵。人们从前者马上可以得出在全球生产结构中各经济体的地位和作用不平等的概念。但是，用中央经济和边缘经济的概念来取代发达和欠发展的概念是不完全甚至是不正确的，同样，也不



能用自主型经济和依附型经济的概念来代替。事实上，不论从各自所涉及的范围来说，还是从各自的理论内涵来说，这些概念都是有区别的。依附的概念直接反映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运行情况及其生存的条件，显示的是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且不仅反映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也包括外部情况。欠发展的概念则侧重表现产业体系的状况或差异程度（尽管也产生一些社会“后果”），而不强调对生产和消费起决定作用的事物（就内部而言，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就外部而言，如殖民主义、被世界市场边缘化等）。而“中央”与“边缘”的概念则突出强调了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欠发展经济所担当的角色，并不考虑在依附情况下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因素。

此外，一个社会的生产体系在经历深刻变革的同时，并不总伴随着决策中心及其调节机制的自发产生。当阿根廷和巴西完成了进口替代过程并开始资本货生产的时候（当时，两国经济已具备了某种程度的成熟性，表现在阿根廷等国家在利润分配上所达到的较高水平等方面），情况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社会在决策方面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生产体系和利润分配方式就可以同发达的中央国家甚至一些发展较好的边缘国家相提并论。举例来说，当一个国家同某一个特定的统治制度决裂，但又尚未完全



融入另一种制度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如南斯拉夫、中国、阿尔及利亚、埃及、古巴及墨西哥革命）。

因此，在全面诠释经济发展过程时，必须记住，在经济体系的差异和自主决策中心的形成的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鉴此，对问题的分析就应该不仅只弄清各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所存在的结构性差异，还要研究它们在历史上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一融合的。这种观点要求我们非常谨慎地解释拉美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不少专家曾强调拉美发展中的“不可预见”性。比如说，有些国家为了保护其主要出口产品而实施了货币贬值政策，从而产生了间接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意想不到的效果，即创造了有利于工业增长的条件。然而，很难就此认为这样取得的经济变革（即导致经济随市场而波动且并不试图增强自主性或改变各阶级间关系的经济变革），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本质上改变依附关系。政治势力在国家社会中的行为也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方式。因此，将对经济发展所作的全面诠释完全建立在市场刺激和自卫性反应基础上的论点是不足以解释工业化和经济进程的。要使上述市场刺激或欠发展经济自身的保护机制能够带动工业化进程起步，



并重建经济和社会体系，就必须在国际市场内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外部变化或条件，但关键是发展中国的政治社会活力中存在有利于获取更大自主权的内部因素。

综上所述，本书提出的中心论点认为，以分析学的观点来看，将所谓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分开来谈是不合适的；与之相反，我们应找出各个国家社会同外部关系的特点。

能够利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新条件”或新机会来制定政策的恰恰正是内部政治经济因素，当然，它们是同霸权中心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同样，内部力量也决定了经济体系“自发”变革的方向及其政治、社会影响的范围。举例来说，在初始阶段，传统的统治集团可能不愿将经济控制权交给在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新兴社会集团，但他们也可能会通过同这些集团达成妥协，来部分改变经济发展给社会和政治领域带来的变化。

反过来，内部集团与社会力量的联盟又受经济变革的方式及力度的影响，而且变革还部分取决于各民族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方式。这是因为，民族经济集团与外部集团或力量之间的联系，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之前和之后有着不同的方式，并且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此外，在很多情况下，国内各政治联盟还会随着国际联盟的变化而变化。

这一观点表明，当我们要弄清民族经济的形成时，如果仅从经济角度出发，将无法准确地认识经济发展过程。而仅仅分析经济的各个成分，比如生产率、储蓄和利润、消费和就业的作用等（它们取决于结构因素和变革的历史过程），也是不够的。


为了使建立在上述经济成分基础上的经济模式有助于对经济发展进行全面分析，必须研究总体社会和经济形势，因为这是经济模式赖以生存的基础。当经济与社会内部关系在“殖民飞地”情况下得到了充分体现时，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政治不平等现象使得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直接关联，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清晰。而当研究“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时，经济的特性就会变得更加“显而易见”，各种政治和社会制约因素则显得更加抽象，但即使是抽象的，它们仍在把握和保持市场机会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在考虑到“依附情况”的基础上分析拉美的发展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族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融合有着特定和不同的方式，这表明每个国家的各个社会集团之间，以及这些集团与外部集团之间都存在着鲜明而各异的内在联系。由此，当我们承认市场流通并不足以解释其自身变化，也无法保证其自身持续性和发展方向时，各种社会力量、集团和机构就在对发展的分析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五节 “国家的欠发展”

现在，我们有必要找出一种解释问题的方法，它既能够凸现欠发展国家和中央经济霸权中心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又不将发展的动力完全归结于后者。事实上，如果说在殖民地依附中，我们可以准确地指出历史和变革反映了宗主国意志的话，那么在“欠发展国家”的依附中，社会动力就复杂多了。在后一种情况中，从一开始起历史过程就存在着双重联系，由此产生了一种“两面性”，或者说一对新的矛盾。从创建一个国家开始，比如从反殖民斗争时起，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政治中心就试图凌驾于市场之上并获取一定自主权；然而，各种经济联系却继续客观地取决于外部市场，并制约了自主决策和行为的可能性。或许拉美国家发展过程的社会问题症结恰恰就在于此。

“国家的欠发展”状况使这些国家既屈从于外部世界，又根据“国家利益”调整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这样就使欠发展国家社会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其社会集团的行为和结构方面都带有自己的特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面分析发展时要研究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的原因。因为



这些联系是通过各社会集团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而正是各社会集团的具体行为客观上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联系在一起。同时应强调的是，这种行为往往是指国家行为，但也包括国家同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一切联系。这样，依附就不再只是一个内部“表述”，它同时也拥有了作为特定结构关系模式的真正属性：它是阶级和集团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模式，意味着一种在结构上保持同外部经济联系的统治形式。这就是说，在分析依附时我们不应将其视为一种“外部变量”，而应在依附国家各社会阶级间关系体系的框架内对其进行分析。要进行这种分析，还必须摒弃那种认为在依附国家内，各阶级的行为及它们间的关系与中心国家在原始发展阶段所发生的情况具有相同性质的观点。关于中心国家发展初期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运作方式，人们普遍认为，市场的自由运行在消除统治集团之间利益冲突方面起到了裁判作用。因此，用利润来衡量的经济合理性就成了社会规范，而消费和投资则在由经济体系的增长所决定的范围内得以确立。此外，人们还认为经济体系之所以有扩张的可能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充满活力的集团，它拥有投资决策权以及充分和必要的权力条件，足以将一项符合其利益的指导方针推向整个社会。由此可见，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经济阶层决定着经济体系运行的效率和

进行经济变革的社会共识。

简而言之，可以认为，统治集团体现了整体利益，而市场恰如其分地发挥着其协调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作用。这里的“恰如其分的作用”是指为经济发展服务，并排除其他集团要求分享“进步”果实和参与决策体系的能力。只是在最初的工业化努力得以实现很长一段时间后，民众阶级才有条件成为政治和社会的参与力量^①。“发展原型”国家的民族经济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张而得到了加强，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在随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统治体系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上面所说的“发展原型”国家并没有精确的概念加以界定，只是泛泛之谈，价值不大。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类国家与拉美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事实上，由于在发达地区和欠发展地区之间（更精确地说是在中心社会与依附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依附关系，而归根结底，这种依附是建立在各种形式的经济剥削之上的，因此我们的分析就不能对这一基本特点视而不见，反而将一个事实存在的普遍现象当作一种非常规的现象。

^①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阿兰·图莱纳所著“圣保罗工业化和工人觉悟”一文，《劳工社会学》，1961年4月号。



“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概念往往会产生一种混淆，即认为要想在边缘国家获得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必须重复中心国家经济的变革过程。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各中心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心经济与边缘经济之间的关系。很多“欠发展”经济，比如拉美经济，从殖民地时期以及此后形成民族国家时起就加入了资本主义体系，并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一直是这一体系的一分子，但不应忘记的是，它们始终都是作为边缘经济而存在的。

对资本主义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研究不是为了边缘国家去重复历史，而是为了弄清楚在每个特定阶段，边缘与中心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产生的。要分析的方面有好几个，其中之一是分析资本主义作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特点。在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存在着某一种资本主义凌驾于其他种类资本主义之上的各个阶段，比如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等，但确认当前拉美经济同这其中哪一阶段最为接近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拉美经济并不是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派生经济。但是，有必要解释清楚不同阶段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与依附之间的关系对当时的拉美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样道理，“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在资本主义的三个不

同阶段中可能都作为一种趋势存在过，且在特定的阶段中会强于其他阶段。因此，在分析中，要参考依附国家的体系来阐明这些概念的内涵。

这些阐述本身也包含着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历史内涵。拉美国家作为依附经济，在资本主义的各个不同阶段与不同的中心国家相互联系，经济结构在这种关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殖民地时期同宗主国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联系、随后对英国的依附以及最后对美国的依附均具有丰富而不同的内涵。举例说，英国在其工业化扩张过程中，曾希望依附于它的边缘经济取得适度发展，因为英国需要它们提供原材料并使它们成为进口英国工业制成品的买方市场。因此，英国要求依附经济的生产能够展现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现代化；与之相反，美国经济拥有自然资源和国内市场，它的经济发展相对更独立于边缘经济，在某些情况下，美国甚至还同原材料生产国进行竞争。对美国的依附关系也就由此具备了美控制其他经济发展的内涵，它包括对原材料生产和潜在经济中心的控制。所以，在目前的经济体尚未形成之前，美国经济对拉美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如英国的那么重要。

因此，我们要强调，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发展中”国家正在重复发达国家的历史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历史条件是不尽相同的，在



某种情况下，由于所谓的资产阶级征服行为，世界市场的形成与经济发展得以同时实现；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发展是在世界市场已经被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所瓜分，同时市场关系和资本主义特性关系在两个国家集团之间业已确立的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同样，因为存在各种差异就将某种发展视为偏离了发展的普遍模式也是不对的。从本质上讲，应该将那些第一眼看上去是偏离了经典发展模式的或不完美的各种事实、行为方式和社会经济过程，视为对社会经济体系进行分析的核心内容。

第六节 民族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类型

应该说，“殖民契约”被废除后，边缘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边缘经济”应该成为“独立国家”形成的条件之一。

“殖民契约”（历史学家们如是称）的废除，以及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扩张是 19 世纪“新兴国家”形成时期的主要历史特征。中心工业化经济的扩张——首先是英国，之后是美国——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在此前的殖民扩张时期建立起来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基础上开始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从独立时期开始，随着中心国家的扩张不断受

到可能形成不同类型的联盟、反抗和紧张局势的民族条件的制约，新兴经济和新兴社会表现出折射型和本土型活力。

边缘民族经济与资本主义进程各个阶段（其控制形式各不相同）的联系是通过源于过去并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经济结构来实现的。一个通过某种高消费产品与国际出口领域相联系的国家，在竞争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其发展模式及可能性将是不同的。同样，在“开发型殖民地”和“人口型殖民地”（即经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开发为基础的地区）实现国家一体化以及形成国内市场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宣布独立之后，在拥有民族经济基础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内部政治—行政管理抗器以推动和执行“国家政策”是较容易的。此外，经济的物质基础本身（例如，对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占有形式），也会对国家形成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方式和后果产生影响。

在基于这些因素的每一种可能的联系方式中，经济和政治体系正是体现依附基本特性的主要方面。因此，拉美国家阶级关系的形式和作用与中心国家是截然不同的。简言之，可以说依附的每一种历史形态均产生了各阶级之间决非静态、而是充满活力的特定秩序。纵观历史，从一种依附方式向另一种依附方式的过渡，总是在已有阶级关系或集团



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比如，民族生产者集团在殖民时期既已获得其经济基础的增长，在从殖民依附向对英国的依附过渡的过程中，它凭借自身经济基础而成为社会依托，这使得该集团具备了要求重建社会秩序的条件，并注定了即使它不能获得完全的控制权，也将至少享有特权。在美国取代了英国的霸权地位后，游戏中又增添了新的、但仍然是源于过去的因素。当时，出口商集团不断壮大，城市阶层也得到显著发展，这一新的情况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得到了体现。在此需指出的是，即使依附的新形式是国外因素作用的结果，国内各阶级之间的联系也并非与之无关；相反，正是各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依附成为可能，并为依附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从根本上讲，一国依附型经济体系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内联盟体系所能提供的扩张能力。比如，一个看似荒谬的例子说明，近年来，由于民众要求参与政治体系的压力日增，因此，民众的参与也已成为有效促进经济活力的要素之一。

如果认同这一观点，也就是承认民众的压力有益于拉美的的发展，无论根据欧洲标准还是美国标准，它所展现的都不是需要被修正的偏差，而是由于民众的社会边缘地位所决定的不同于其他阶层的斗争方式。有益于现代化的压力导致试图参与权力并同新兴经济集团结成同盟的民众阶级与旧的统治



阶级联盟产生了“对立”。

在这一过程的初期，工业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境地。与此同时，作为城市新兴阶层的一部分，工业集团实际上是这一集合体中惟一真正拥有经济基础的集团，它们因此有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当然，尽管带有新时代的特征，它们在当时的经济体系中也还不具备决定性作用。由于工业集团可能通过生产方式吸纳城市民众阶层，它的战略地位为其与当时的社会体系建立联盟或达成默契创造了条件，这就解释了为何工业集团在农业出口体系发生危机后便具有了重要性。

第七节 对发展全面分析的展望

综上所述，社会学分析是在认识到各种不同行为方式特性的同时，通过定义欠发展社会的结构特点来诠释表面上的“偏差”的。毫不夸张地说，为重新定义各社会阶级在欠发展体系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它们为支撑权力架构、创造社会和经济活力所建立的联盟，必须努力进行新的研究。

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国家，其经济体系的内外部两个层面，在社会领域则表现为社会的构成和运作也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根据外部压力和对外关系



而定；根据国内社会的阶级分化等内部因素而定。

欠发展社会的复杂性使一些相互矛盾的价值取向得以共存。因此，旨在建立“民众工业化社会”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以及“阶级”乃至“团体”等典型社会规范占主导地位的现象此起彼伏。

总体上看，这种混乱状况正是欠发展社会的典型特征。鉴此，有必要提出一些概念和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剖析和认识欠发展社会。这些假设应该突出相对自主的国家（这使得国内权力状况被不断提及）与发展进程之间的矛盾。这里所指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通过与中心经济的新型联系而受益或正在受益的过程。

对通常认为分析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因素提出质疑，这恰恰是我们的观点。尽管在现实历史条件下，正是那些在压力下产生的社会、经济变革打破了欠发展和依附社会的内外部平衡，但这一政治进程本身并不一定能产生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结果。国家的发展不是自发产生的。这也就是说，对发展的分析应该始终将出现经济萧条和停滞的“可能性”考虑在内。在研究国家发展的具体可能性时，不能仅考虑结构因素，还必须对那些试图维持现状或推动社会变革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表现方式进行分析。此外，还需确定存在哪些社会“价值取向”或意识形态。由于各社会力量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且蕴



含着经济增长的多种可能性，因此只有在全面分析了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在内外体系中的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对发展作出完整的诠释。



第三章 “对外扩张”时期的基本情况

本章试图对地方社会集团如何获得体制上的保障，从而确保其参与生产的过程进行研究，并由此分析拉美国家发展和巩固的条件及可能性。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论断是，各阶级和集团受经济利益驱使建立起权威和权力形式并形成“合法秩序”，从而确保了国家政体的建立和对本国经济的控制；这一“合法秩序”得到了被排除在“利益团体”统治核心之外的阶级、集团和民众的认可和遵从。上述观点要求在诠释发展时必须超越以下观念：物质基础（即生产体系，它是控制生产的集团和阶级渴望获取经济利益的基础）自身，或者这一基础根据世界市场条件所进行的自我调节，即能确保权力体系自发变革，并引发社会结构的民主化。在摒弃了这一不正确的观点后，就能明显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由于拉丁美洲各国国情不同，从独立国家政体建立时期起，经济体系和权力体系之间的各种关系形式产生了拉美国家不同的发展和自治的可能性。

鉴此，为了认清“对外扩张”时期的情况，必须从研究这一时期的各种困难入手，对美洲国家如何与世界权力体系及边缘国际经济相联系的历史情况进行哪怕是肤浅的分析。

在粗线条上，可以将殖民地与宗主国^①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人口型殖民地、开发型殖民地和基本未获开发的领地。

显然，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生产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殖民地世界与中心宗主国的关系方式。这些经济基础的总体状况是：在农牧业殖民地中，主要表现为对土地的大量占有，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理上的分割；在开发型殖民地中，除了对自然资源、矿产资源或森林资源的开发外，还存在着商行组织；而在最后一个类型中，看似保护未开发地区的举措，实则服务于宗主国的战略利益及资源储备政策，以便将来再行掠夺。

在“殖民契约”废除后，即当拉美的殖民地产

^① 由于本章篇幅和目的所限，因此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殖民时期加以详细论述。



品不再经由伊比利亚的港口和海关而直接运往英国后，拉美凭借本地区社会集团的力量组建国家成为可能。由于殖民时期地方社会集团的历史形成不同，导致这些集团建立本国政治和经济控制体系的能力也有所不同。

国家形成进程中的难题往往在于：

(一) 如何保持地方对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出口生产体系的控制，该体系曾经是与外部及基本经济活动保持联系的主要途径；

(二) 如何在殖民时期的各社会、经济集团之间建立一种政治联盟关系，以使曾经控制对外联系（指与国际市场和中心国家的联系）的集团保持最低限度的国内权力，从而实现政治稳定，并形成由出口生产部门主导经济的政治局面。

在某殖民地经济已成为宗主国经济的农业基础的情况下，在那里形成国家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这不仅因为它们出产中心经济离不开“殖民地”产品，如糖、咖啡和可可等，而且这些产品宗主国又由于气候、技术等各种原因不能自给自足从而保证了前殖民地市场的延续性。此外，还因为在这类殖民地中存在着一批有能力控制当地生产体系及国家机器的本土经济和政治精英。

19世纪，在原“开发型”殖民地（如矿藏地区）或处于殖民市场边缘的地区形成国家的可能性

则较小。那里的政治体制大多是在西班牙被迫面对世界贸易体系主要力量重新排序的困境时形成的；而其他少数政体的形成则源于英国和美国之间势力范围的划分，这种政体是为那些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多少实质作用，仅起着巩固新兴国家作用的本国政治寡头服务的。

总之，这些国家的疆界与19世纪初即已融入外部世界、经济和社会都较“发达”的地域并不吻合。即便是在地方出口经济相对稳固的殖民地中组建国家，其进程也取决于虽处于国外市场边缘，但与之保持着联系的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要么生产国内消费经济的基本产品——木薯、小麦、玉米等，要么生产能保障出口经济赖以运转的主要产品——母骡、腊肉等，要么恰好成为出口部门的补充形式，如畜牧经济与肉类出口贸易部门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例证。

殖民契约的破裂以及国家政体的形成导致在拉美国家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曾经控制当地出口生产的集团必须在这种新秩序中与下面两方面建立和保持政治经济联系：对外，调整与新兴霸权中心的关系；对内，与尚未直接融入“外向型”生产、贸易或金融体系的地方寡头建立联盟关系。



第一节 国家对生产体系的控制

在拉美国家的历史中，这一过程既不雷同，也并非一帆风顺。拉美国家宣布独立后，新兴政体中的各地方集团间经历了一段尖锐斗争的时期。通过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这种带有“无政府”时期特征的斗争，确立了如前所述的联盟和民族市场的轮廓，权力集团所建秩序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也得到了承认。由此，那些“阴谋独立”的集团与世界市场及其他地方集团的联系得以恢复，并形成了早期的国家欠发展和依附状况。

抛开 19 世纪众多国家形成的具体过程不谈，可以将国家特征及形成国家的可能性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整体而言，英国是其霸权中心，该体系是出于对原材料的需求而与边缘国家发生联系的。对边缘国家的生产性投资并不是英国工业扩张获得活力的必要条件，但确保其获得初级产品供应却是产生这种活力所必不可少的。因此，19 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在拉美表现出贸易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特点，而投资只是集中在当地经济尚无条件开发的领域，这一点在交通领域表现得

尤为突出。多数情况下对交通的投入是向当地工程提供由国家担保的贷款，而直接投资较少；但另一方面，霸权中心从根本上控制了边缘国家的对外贸易，而未让位于继承了殖民时期生产基础的当地经济阶层，惟一较为明显的例外是在矿产开发领域，但即便是在这一领域中，外国投资商与当地产业主也是共同进行开发的。

(二) 由此推断，由于新的霸主不仅不进行干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甚至鼓励民族生产体系的扩张，导致殖民契约的破裂使民族生产集团得以壮大。此外，这一壮大还取决于当地生产者集团与那些创建了民族国家的“地方寡头”建立联盟的能力。另一方面，成功建立国家秩序的可能性不仅受制于垄断港口、操纵基础生产部门的出口控制集团调节“市场”的能力，还取决于部分统治阶级巩固其政治统治体系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建立一个非地方性质的行政机构和一支国家军队，对于最终建立国家机器并将“事实上”的统治转变为“法律上”的政权具有重要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过这种多少有些类似的过渡性致体，例如智利的波塔莱斯时期，阿根廷的罗莎斯时期以及巴西的摄政时期就是其中的几例。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民族经济能取得多大成就取决于下列条件：

- (一) 对初级产品的支配能力；
- (二) 丰富的劳动力供给；
- (三) 对可耕地的支配能力。

如果具备了这些条件，企业家们就可以在无需“积累政策”帮助的情况下进行资本积累，而后两个条件则构成了资本形成的最基本和最直接的生产要素。

很明显，在上述条件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出口型经济的扩张所遇到的困难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非经济上的。的确，如何通过奴隶制度、移民方式或者阻止前殖民地人民融入所有制体系，来确保占有土地和控制劳动力，是出口经济控制集团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与不属于出口体系的地产主集团结成联盟并确保这些地产主对大庄园的控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出口集团不仅可以利用这一联盟来左右政权，还可以阻止贫穷的殖民地人民、移民或者“获得解放的奴隶”占有地产。

为此，出口经济部门组成的“现代”集团成功地与“传统”集团建立起了联盟关系。如果说前者为扩大自身利益而建立起本国经济体系的话，那么它与后者建立联盟也是为了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因此，两个集团间的分歧并没有随着这一联盟的建立而消失，各国政治寡头曾多次与出口商集团的霸

权展开斗争，以保证更好地参与利润分配^①。但是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到种植业主、矿业主和银行家等出口商集团在中心经济与“传统”农牧部门之间所起的重要桥梁作用，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国家统治体系的全貌。显然，中心与边缘的联系正是由出口商集团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的。在国家机器中，现代统治集团与传统统治集团达成了妥协，这就使得国家职能往往具有两面性，首先，它体现了从出口经济体系分化出来的“现代”集团的意志；其次，也代表看本国政治寡头的利益，而后者可能阻挠父系主义向更富效率的官僚主义转变。在政治层面上，拉美国家的历史中也同样存在着这两个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进入20世纪，随着出口经济模式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及部分国家的民族经济中出现了诸如城市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新兴部门，这一矛盾也在不断加剧。自那时起，中产阶级开始着手对政治秩序进行变革，从而使两大统治集团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②。

总体来说，上述情况导致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

① 比如巴西南部的腊肉生产者对帝国发动的革命，以及在地方省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展开的斗争。

② 这些分歧远不足以构成根本对立。在对现存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所谓“民众部门”在政治游戏中出现后，这种分歧逐渐减弱。



在十分明确的条件下相互融合，这些条件的主要特点是：

(一) 在边缘国家中，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由于国家关于出口产品的“民族政策”对国际市场具有刺激作用，因此，外国投资决策有时“取决于”国内政策，它决定扩大或压缩生产；

2. 这就意味着，资本既始于国内经济体系，又止于国内经济体系^①。这里所说的第二点与上述第一点（投资政策）相互关联，它是国家获得相对自主的生产决策权的关键，因为它表明本国企业集团确实存在。

(二) 同时，出口取决于控制着国际市场的中心经济所设置的种种贸易条件（价格、配额等）。

(三) 国家经济（作为依附经济和发展中的经济）融入世界市场的可能性与本国生产集团重新主导对外和对内政治经济联系的能力密切相关：

1. 在对外方面，贸易条件由中心经济的金融、贸易部门及其在当地的代理人来决定，这使得民族经济在排除了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殖

^①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此类生产的基础是资本的直接形成，这是唯一一种经济发展可能由国家控制的情况。参阅塞尔索·富尔塔多所著《拉丁美洲的发展和萧条：结构性的接近》一文，耶鲁大学新天堂出版社，1965年出版。

民地利益”的情况下得以重新主导贸易体系；

2. 在对内方面，“国家秩序”基本建立，同时通过与被排挤在出口部门之外，或在其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寡头之间的斗争及联盟建立了国家。这样，在现代庄园（由于其具有城市化特征及自己的贸易和金融集团，社会学称之为“种植园”）与传统“庄园”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联盟关系。这两者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从“无政府状态”末期即1850年到对外增长模式发生危机的1930年之间）成为国家（指那些控制着本国出口产品并已融入世界市场的国家）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支柱。

第二节 飞地经济

本国经济集团并非总能保持其对生产的控制或者主导地位。的确，在特定的环境下，有些拉美国家的经济通过由国外直接控制的主要初级产品的生产活动而融入世界市场。根据民族经济发展初期的差异和扩张程度的不同，民族经济受国外直接控制这一情况形成的条件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不同的。普遍来说，拉美经济中飞地的形成大多反映出，由国家控制的经济部门因无力应对和参与



要求具备技术条件、贸易体系和充足资本的商品生产的竞争而逐渐遭淘汰的过程。另一些情况则完全不同，如加勒比地区的大陆国家，其民族经济集团的生产仅作为边缘化的生产而融入世界市场，那里飞地的形成是中心经济扩张的直接结果。

上述两种建立在飞地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均背离了本国经济集团的初衷，相反却反映出中心经济的活力及其中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特征。

同样，在上述两种情况中，生产性飞地都程度不同地主导着民族经济体系，并赋予其共同的特点。的确，从国家生产体系只有依靠国外技术和资本的参与，或者不得不从属于国际贸易体系才能获得经济增长的那一刻起，本国生产者的活力便开始在民族经济的发展中逐渐失去了重要性。由此，本国生产者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在国内建立一套自主的权力和资源分配体系的能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况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这样，直至 19 世纪末期一直作为欧洲资本主义特征的金融贸易控制方式被经济行为方式所取代，那种金融贸易控制方式曾对中心经济向现实或潜在重要的边缘国家的生产部门进行投资（其目的是进一步控制这些生产部门）起过决定性作用。也是在这一时期，由于世界新兴霸权中心——美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及其对初级



产品的依赖相对较小（美国自己也生产这些产品），使通过美国市场与世界贸易相联系的拉美经济的扩张受到限制，这比与欧洲进口体系相联系时经济所受的限制要多。

就经济层面而言，在那些受飞地经济推动而使国家的出口体系融入世界市场的民族经济中，出现了作为中心经济技术和金融延续现象的“现代部门”。随着民族经济趋向于围绕这些“现代部门”而进行自身组建，形成了出口经济大规模专业化和过剩商品大量外销的局面，这使得出口体系的竞争力得到加强。但“外向型”经济增长并不总能导致国内市场的形成，而是使收益集中到飞地经济部门中。

飞地经济又可分为两个分支，即矿业飞地和农业飞地。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们在使用劳动力、生产率水平和资本集中程度等生产技术和条件方面存在着不同。比如，在农业飞地中雇用大量劳动力，资本集中程度较低；在矿业飞地中劳动力使用相对减少，资本集中程度却较高。从民族经济的角度看，两者在收入分配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低水平倾向。但由于在矿业飞地中存在着生产扩张，因而出现了按工人专业化程度支付不同工资的良好趋势，这并不影响面向国内市场的经济部门。而在农业飞地中则不同，它无需技术劳动力，而非技术劳动力比比

皆是，因此并不存在要求提高工资的突出压力。结果导致了农业飞地经济的扩张和现代化加剧了对土地的占有，这影响了粮食生产甚至其他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由此可见，上述两种情况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效应。

从社会和政治体系角度看，通过飞地经济所获得的发展和通过国家控制生产体系而取得的发展有着不同的结果。如果说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联盟导致了飞地经济的发展，那么反过来，飞地的发展也给国家统治结构及其与国外的联系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在此，首先应分别指出，拉美经济中飞地的发展进程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一，事先存在一个民族出口商集团，它丧失了对本部门的控制并通过飞地融入世界市场；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飞地的形成直接导致了出口生产的发展。在后一种情况中，飞地与由“传统”寡头控制的、在市场中失势的本国经济部门同时存在，但国家经济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远远小于资本主义生产者。从国家角度来看，在两种情况中均存在着前面所提到的问题，一是需要确定本国统治体系得以延续的基础和条件，二是需要确定这一统治体系的各集团在新的飞地生产体系中的参与程度。上述两种情况所要求的政治联盟与内外两方面都有联系：与以投资公司为



代表的国外部门的联系；与国内部门的联系则表现为，某个集团单独地或与其它集团结盟，建立起一个足够强大和稳定的权力控制体系，以便与国外部门协商并达成有关开发飞地经济的条件。在确定这些条件时，由于飞地的形成如前所述有两种典型的类型，因此国内部门对国外部门的相对自主性也有所差别。

在存在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出口型民族经济的情况下，国家统治集团在部分生产部门中可以保护本国利益，并运用政府特权，如通过颁布税收、强制性再权资等政策实行自我保护。在此应该指出，维护本国利益的能力根据市场的情况以及本国统治阶级的内部凝聚力的大小而有所不同。在另一种情况中，随着“传统寡头”对国家行政机构的控制日益依赖于被国外控制的经济部门所创造的财富，其软弱性使得他们在面对“外国部门”时愈发无助，最后往往转变为依赖于飞地经济的集团。

当国家统治集团至少能部分维持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并在其自身体系内建立起与国外部门联盟或“对抗”关系时，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下实现的历史发展，即，在国家控制生产体系的前提下实现的外向型（面向国外市场的）经济发展，其特点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民族贸易和金融集团充当着与国外部门进行联系的纽带，因而作用似乎最为



重要；而农牧集团和矿业集团的经济行为仅局限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因而重要性较小。另一方面，由于前面提及的集团与阶级之间的联盟体系加强了国家的管理职能，并形成了一个由飞地税收供养的官僚集团，这使得民族贸易和金融集团得以经常影响统治阶级各部门在行使政治和行政而非经济职能时的行为。在通过飞地形成出口模式的最成功范例中，围绕公共官僚集团逐渐形成了具有官僚性质的中产阶级，它与进口和金融部门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一起，构成了拉美飞地经济国家最初的“传统”中产阶级，也就是说，这一中产阶级不是在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过程中形成的。

当一个国家生产阶级没有能力或可能在飞地生产结构中重新确立其地位时，正如我们所见，该国的统治集团在生产体系中仅起次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前述特点被弱化，社会结构仅由下列要素组成：雇工群体（其规模取决于矿业经济还是农业经济）、尚能控制官僚机器和军队的弱势寡头以及生产率低下的大庄园体系（这一体系受弱势寡头间接控制，而被“上校们”〈地方政治头目——译者〉直接控制）。

概括起来说，通过对在飞地经济中具有一定重要性的民族经济集团的抽象分析，可以认为，飞地的经济与政治体系具有以下内在联系形式：

(一) 生产在双重意义上是中心经济的直接延续，不仅投资决策直接取决于国外，而且资本的收益（税收和工资）仅仅在依附国家内“流过”，最终增加了中心经济可用于投资的资本量；

(二) 实际上飞地并不与本国经济部门（指与国内市场相关的基础生产部门或农业部门）发生联系，但通过权力体系等渠道与依附社会存在联系，因为正是依附社会确定了外国特权的条件；


(三) 从世界市场角度看，飞地经济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是建立在中心国家市场框架之内的。



第四章 转型时期的发展 和社会变化

我们认为，通过两种基本方式之一而融入世界市场的拉美经济，在国外需求的推动下得以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多样化。同样，社会结构也缓慢而持续地发生着变化，新兴社会集团随着出口经济集团的形成悄然而生，从而增添了经济和政治利益对抗中新的因素。

的确，正如前几章节所述，如果认为在 19 世纪，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仅仅促进了农业、矿业或畜牧业部门的发展的话，那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导致了重要的金融和商业部门的建立，而且，使得各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市工业经济的萌芽。同样，自 19 世纪起旨在建立出口体系的各种社会运动、政治主张和联盟，也都体现了以不同方式与生产过程相联系的



各个集团（如大庄园主、农业资本家、矿产开采者、商人、银行家等）的战略意图。因此，找出上述集团在各国所表现出的特定关系方式，对正确理解所谓“转型”时期所发生的变革显然具有战略的重要性。的确，“转型时期”是一个历史结构过程，正是通过这一时期，在社会和政治动力的作用下，出口型经济本身的分化为那些支持出口体系的社会阶层以及被不准确地称为“中产阶级”的这一社会阶层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些阶层（即初期工业资产阶级以及相关的技术阶层、文人和军事官僚、雇工阶层等职业团体）的形成及特点与建立出口体系的方式密切相关，而出口体系形成的方式又取决于地区各国的历史条件。在 20 世纪的前 30 年中，尽管由于各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而存在着不同的情况，但新兴社会集团在所有国家中均已逐渐形成气候。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比如，是能够相对自主地控制本国出口体系的国家，还是飞地经济在外向型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参与的模式和社会运动的类型有着不同的内涵，通过这些社会参与和社会运动，形成了拉美国家之间各不相同的政治生活和社会面貌。


另一方面，在一些由民族集团控制国民经济的国家里，部分民族集团发起了反对飞地制度的运动，这为这些国家实行自我保护政策以维持其对生产体



系的有限控制创造了条件，并使通过商业金融资产阶级或农村资产阶级与飞地部门达成基本协议成为可能。而在其它国家中，出口体系在国际投资商集团的压力面前所表现出的自身脆弱性，使上述自我保护和适应性政策形同虚设甚至根本未有出台。由此，国家从生产过程的行为者转变为外国企业的代理人，这制约了国家在经济上对面向国内市场的本国农业或矿业生产实行有效的控制。这些不同的特点影响了拉美国家着手建立其经济模式的可能性和方式，并使国外部门能够借助国内市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进一步增强其自身的经济活力。同时，本国社会集团的活力也反映并促成了上述不同局面。

无论是在生产体系由国家控制的经济中，还是在具有自身特色的飞地经济中，都明显地存在着欠发展和依附的共同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国家的“边缘地位”。在这一意义上，国外需求的减弱导致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这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世界贸易体系的危机和重组，因此不应忽视这一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同样，在充分分析了拉美工业化的条件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上述因素及世界大战刺激了进口商品国产化进程。

这一结论很自然而明确地表明了世界经济危机对拉美（其政治上的“寡头”统治体系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即已开始衰落）经济的重要性；同时



表明，由于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秩序，拉美政治社会体系的重建也出现不同的形式：

（一）建立在飞地社会经济秩序基础上的社会，以及地方农业出口和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生产体系的社会，他们克服政治、社会危机的能力是不同的。

（二）在这两种基本情况下，拉美各国生产体系的内部分化以及社会集团的重新组合，为各国社会集团在出口体系的基本框架内形成新的联盟创造了不同的条件。这些联盟的形成及形成的可能性决定了出口型“已建秩序”到底能维持多久，或者相反地，决定了“出口型体系”向另一种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城市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等与国内市场密切相关的集团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过渡的时间和方式。

在此，有必要描绘出几条主线，以清晰地揭示因寡头政治和出口体系危机而引发的社会变革。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指出新的政治联盟的形式，也是为了明确说明国内权力体系的政治社会危机与世界经济危机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一节 生产由国家控制的社会转型时期

在经济建立在由国家控制的出口生产体系之上



的社会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阶层是其与众不同的特点。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这一类型的社会中，权力联盟（它确保了生产体系成为合法社会秩序，并保障了国家政体的形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部门的活力基础上的。该资本主义部门组织了生产和部分贸易，并在某些国家控制着国内融资渠道。可以肯定的是，为能建立一种国家秩序，资本主义部门必须与生产率低下的庄园主和官僚—军人集团组成复合型联盟体系，而它与国外的联系客观上成就了其权力地位。应该指出，在这类国家中形成了一个民族扩张资产阶级^①。

正是这一资本主义企业阶层的存在及其分化，以及它与代表庄园主利益的政治力量所建立的特殊联盟体系，为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

① 这里所指的资产阶级与欧洲资产阶级在概念上有着历史性的差异。原因之一是，城市作为政治权力的基础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其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是不完全相同的。我们在此使用这一概念，目的在于突出“资本主义生产者”或“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特点（绝大部分与农村相关）与“地主”、“封建集团”或“大庄园主寡头”的概念完全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后一类在这些国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总是附属于资本主义企业部门；因此，重要的是认识到，以领主或封建制度的概念来概括它们的特点是相当不恰当的。

新兴社会集团（它是在出口体系动力推动下产生的）的压力所导致的政治体系危机根据以下两个同步进程的强度和方式而有所不同：某一特定统治形式的巩固导致了出口体系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生产体系的分化。由此，城市工业经济缓慢形成，出口型经济的新兴和配套部门也得到了发展。

这样，至少可以证实两种与国家统治体系相关的具体情况：


（一）在某些情况下，或在某一时期中，某一“出口贸易”部门建立了金融体系，并垄断对外经济联系的必要条件（控制海关，或在与国外市场关系中占据战略地位），由此它可能支配整个国家，尤其是支配其他生产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最有利于国家统治以阶级统治的形式出现的条件，这一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出口体系的统治阶层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统治阶层，以此表明存在着一个维护“统治阶级”（包括相互间存在着矛盾的地方性质的资产阶级、大庄园主集团及相关官僚阶层等）整体利益的“阶级实体”。比如，布宜诺斯艾利期的资产阶级在阿根廷明显占据支配地位即证实了这一点。

（二）在其他情况下，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能无可争议地代表整个统治体系的“阶级实体”。因此，寡头间的联合成为通常的统治方式，即由于在统治



阶级内部缺少一个明显具有霸权的阶层，使得不同的农业出口部门之间形成了某种默契。在国家权力沿袭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因为某几个特定阶层都可能已具备足够力量正式掌控权力中心），统治阶级各部门间精确界定了各自在国家内部的势力范围，这样，各地方权力中心的自主权得到了保障。当统治阶级中的资产阶级部门和出口部门产生矛盾时，联盟的其余成员的力量就得到增强，国家或地方权力的维系也由此转而有赖于大庄园主、地方资产阶级、军人阶层以及与之相关的官僚集团更加积极的参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与前一类完全相反），纯粹由寡头和大庄园主统治的现象更为明显，并掩盖了统治体系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特征（1930年之前的巴西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特殊和极端的情况下，这两种表现更为明显。第一种情况是，当统治联盟内部其他部门的脆弱性导致在统治体系中形成一个实际上的“垄断阶级”（假设它是出口部门）时，出口部门即以统治阶级的面目出现，其扩张能力盖过了所有其他部门，或与它们建立起明确的从属关系，而非联盟关系。在拉美，这一情况恰恰出现在经济最为脆弱的国家中，因此，这一所谓“垄断阶级”并不等同于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而是指掌握着土地所有权的社会集团所控制的那些农业出口部门。这样，在同一



社会集团内，寡头一大庄园主阶层以及资本主义出口部门的代表性特征都占据优势地位，正如中美洲的情况所突出反映的那样，其经济越来越依赖于飞地体系，从而使得民族部门自主制定政策的可能性日益渺茫。

第二种情况是，当统治阶级各部门之间为争夺霸权而产生对抗时，也可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已不再是一种默契，而是通过协商清楚地划分出各自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是主要处理对外事务的政府，而在国内，行政机构中对立的各“党派”则按部门和区域原则划定各自在国家机器内的势力范围并行使着国家职能，从而形成了政府机构中的各个官僚阶层。

应该强调的是，在拉丁美洲，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寡头和大庄园主为争得国家权力而结成联盟并在联盟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哥伦比亚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国家中，也存在于乌拉圭等自19世纪起即开始经济“现代化”的国家中。在乌拉圭，因权力之争而达成的平衡使人们得以区分开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红党政权就体现了其中的一种统治方式，由于存在着一个活跃的资本主义出口部门，明显带有资产阶级特征的集团取得了霸权地位，这与前述的第一种情况，即阶级统治的情况相似。

另一方面，民族生产体系的多样化程度也是我



们所关注的决定转型方式的条件之一。仅从纯经济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可以指出形成不同的新兴社会集团和以不同的方式巩固统治体系（这两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三个条件。的确，如果考虑到是否存在出口经济的配套部门以及国内消费品生产体系的分化这两个重要方面，则可以肯定地说，在生产体系由国家控制的国家中存在着以下几个条件：

（一）出口生产体系单一，并且在向国内市场提供商品的过程中，该体系并未实现多样化（如在中美洲）；

（二）在多样化程度较低或根本不存在多样化的出口体系的基础上，产生了商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如粮食生产达到高潮之前的乌拉圭和阿根廷）；

（三）出口体系实现了多样化，由此产生了出口配套部门，并形成了一个服务于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如巴西）^①。

上述条件也许可以使人们从“经济”角度认识社会，但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对分析社会变革的结构性条件具有决定意义。实际上，在解读社会变革

^① 正如在正式的分析中所发生的一样，很明显，所指出的情况不是成对组合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真是成对出现的话，“类型学”也将会是非常不完整的。它们更多的是所发生的历史情况的定型。



时，重要的是要了解在这些经济条件下，统治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当是否存在出口配套部门被看作是一种统治（无论这一统治是以一个阶级部门将其控制强加于体系的其余部分的方式，还是以各阶级结成“联盟”并共同控制整个生产体系的方式来实现的）的结果时，建立统治体系方式上的差异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由于出口配套部门的存在与否（这与由谁对其实行控制无关）决定了劳动的社会分工方式，因而也影响着经济的内部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关系到国内市场的规模，也会影响新兴社会集团的结构。还应注意到，这些社会集团不是“经济结构”的简单、机械的产物，它们还试图发展或改变这一“结构”，来实现或维持其特有的统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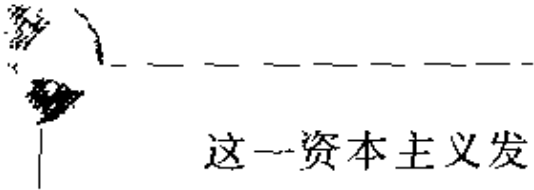
因此，正是社会历史原因使得统治集团，或者通过控制民族生产体系并推行垄断生产的方式，或者相反地，不得不通过与其它地方出口集团达成必要的妥协的方式，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后一种可能性出现与否取决于各国民族市场形成的历史过程。显然，在一些小国更容易形成由出口集团单独实行统治的局面，在那里，国家是这一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均占有霸权地位的统治集团行为的产物；而在大国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则较小，因为那里的民族生产体系十分庞大，以致于不得不通过地区联盟的



形式才能确定国家经济体系。但是，一般来说，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潜在的或明显的趋势，即一个农业出口统治集团试图强制推行单一统治和建立垄断生产机制，以确保其几近霸权的政治统治。

另一方面，经济学认为，出口行业的规模决定了是否会形成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这也就是说，多样化的出口型经济，即在建立出口配套部门方面已达到一定规模的出口型经济，为形成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条件。的确，在出口型经济的转型期，出口经济的增长直接促进了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并刺激了国内消费。这是因为，首先，出口型经济的扩张要求一个与地方生产活动直接相联系的农牧产业；其次，无论从哪方面看，因出口生产扩大而引起的社会分工都产生了一个具有一定购买力的消费群体。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由于农业劳动力消费水平低下，因此农业生产中所雇用劳动力的数量并未对国内消费规模的扩大起到直接的重要作用，而与农牧生产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相关的劳动社会分工，则对国内消费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①。

^① 即消费对国内市场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国内市场的扩大既受制于那些变得更为资本主义化的生产者自身的消费，也与新兴市场（即随着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和庄园的解体而产生的新兴城市中心）的形成息息相关。



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迫使“庄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生产专业化，并打破传统的劳动组织方式（在那种方式下，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由此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得城市中心为应对更加广阔的市场，不断增强了其职能和必要的经济活动。这样，当开始致力于形成国内市场时，城市中的一些新兴社会集团逐渐形成或发展起来，如手工艺者、小商贩、专业人员以及运输、银行、教育、公共服务等相关服务行业。随着国内市场的出现，形成了第一批工业中心，又形成了城市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起初，城市工业社会集团是因出口部门的扩张而形成的，其经济利益与出口部门的经济利益没有冲突，相反，它们是该部门的补充部分。

因此我们说，这些历史结构条件既说明了城市工业部门的形成过程，也决定了出口型经济扩张所导致的社会内部变革的程度。农业出口商集团的联合或分化，以及部分农业出口商集团与新兴社会部门所建立的联盟推动了上述社会进程的发展。的确，寡头统治体系的危机，在那些统治集团之间已形成联合并藉此建立政权的国家里所产生的结果，与在那些未能形成这种联合的国家里，或在那些通过农业出口经济部门的非霸权阶层与新兴社会集团的联盟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社会统治体系的国家里所



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同样，政治架构的扩大在某些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在这些国家中，新兴社会集团通过联盟方式与寡头出口商集团的某些部门共同构筑了经济基础，并能够有效利用其对国家政权的参与和政府投资等经济政策。

下面简要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转型方式。我们将通过研究某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自身的结构性条件，来分析其尝试参与权力联盟的努力。

1. 中产阶级参与出口资产阶级权力体系（阿根廷）

阿根廷农业出口部门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民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化，尤其是刺激了诸如国家行政管理官僚（文人和军人）、专业人员、出口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等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先前已存在的经济活动完全隶属于地方资产阶级和生产率低下^①的大庄园主集团等农业出口商集团。当农业出口商集团能够通过国家机器代表各统治阶层的整体意志时，不同集团便可以在农业出口商集团所主导的权力体系中得以共存。

^① 我们使用“低生产率的大庄园”这一表述，是表示那些与出口型经济没有联系的部门。



在激进党进行革命尝试的政治进程中，1893年至1905年间出现了前面所说的新兴集团，它们通过1912年的“萨恩斯·培尼亚”法获得了“政治上的承认”。

激进党通过伊里戈延当选总统而实现主政（该党获取政权主要应归功于它能够首次成功运用竞选动员手段赢得广大中产阶级和城市民众阶层的支持），并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农业出口商和城市工业部门的联盟体系。由此看出，农业出口体系的权力部门，即牧业及粮食生产者等几近垄断性质的集团具有足够的抗争能力。同样，当1918年的经济危机威胁到激进党政权时，农业出口部门的代言人利用科尔多瓦省的改革、工人罢工（尽管伊里戈延得到民众的支持，但未能有效控制工会）等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带有“新时代”特征，并似乎对政权构成威胁），要求他们曾支持过的本国农业资产阶级和非民众主义的城市资产阶级推行一种较为平和的新的转型方式。此后，阿尔韦亚尔确立了这一转型方式，他允许激进的“非人文主义派”（即“非民众主义派”）参与政权，但拒绝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模式。各社会集团加入新的权力体系后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国家范围内代表国外利益尤其是英国集团（它起着阿根廷政府和外向型民族经济与外部联系的纽带作用）利益的社会集团具有最重要



的作用；民族出口商资产阶级重新占据了优势地位，并直接或通过代言人参与政府。他们通过这种成功的抗争还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即出口体系因此得到繁荣。在旧的出口体系仍然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运转时，中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没有理由为一项可能导致农业出口商资产阶级被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的经济政策去冒险。尽管如此，伊里戈延为实现这一排斥所奠定的基础仍不失其重要性。他建立了石油公司，试图将铁路国有化，并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条件发展了纺织业和冶金工业。在阿尔韦亚尔结束执政后，伊里戈延于1928年再次掌权，“激进派”与某些地方统治集团结成的联盟再次为其重返政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些地方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是门多萨和圣胡安地区的葡萄酒酿造业主。然而，农业出口部门建立起来的统一阵线再次破坏了代表伊里戈延政府的联盟尝试。同时，由于激进党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工人运动（这构成了政治上的威胁）加大了伊里戈延派联盟的脆弱性，因而，即使宣布实行有利于国内市场发展（即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的经济政策也无法平息社会不满情绪了。在乌里武鲁发动政变后，由“保守派”、“反人文主义派”和“独立社会主义派”组成的联盟反映了当时的“转型”方式，即权力体系为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断扩大（德托马索和皮

涅多等独立社会主义者的参与丰富了国家政治的内涵)，但当这些新兴集团开始代表民众的压力时，权力体系会立即与其解除联盟关系。面对可能会扩大民众参与的反对派的压力，“已建秩序”往往通过军事干预或以“爱国主义欺骗”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但当中产阶级的压力与民众的压力（如庇隆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上述手段便不再那么有效了。

2. “传统”中产阶级的参与及寡头—资产阶级的统治危机（巴西）

巴西在转型时期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其社会阶级结构的脆弱性。事实上，巴西外向型经济的现代化是在奴隶制和帝制相继被废除后才在国家政治中得到体现的。此前，帝国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还有效保障了建立在奴隶制度和世袭统治基础上的社会利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在各地方联盟中占政治主导地位的一直是东北部糖业和中部咖啡业的利益（主要分布在米纳斯、里约热内卢省及圣保罗的巴拉伊巴谷地）。同时，尽管存在冲突，其它地方奴隶主和大庄园主的利益，特别是南方、巴伊亚以及远离权力中心的各边缘省份的利益也得到兼顾。此后，帝国中又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右倾并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原始官僚阶层。这一官僚阶层以及



皇帝的最高权威维系着国家的统一，并保全了各地“领主”的自主权。在保留和尊重各地方权力中心的前提下，国家继续维护“总体利益”，即占主导地位蔗糖业和咖啡业主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寡头统治”变得颇具实效并得以延续，也并未因其寡头特性而妨碍其以国家利益为名进行政治交易。尽管统治体系中存在着精英阶层，政治体系仍得以如此运作的原因是，源于欧美的两党制（自由党和保守党）这种政治斗争形式，使得寡头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政治革新意识。有人低估了这种“革新思潮”的政治重要性，指责它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脱离了现实国情。这是错误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控制体系的变革正是由那些“寡头”圈子中的叛逆群体发动的。

1870年以后，当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主开始用移民替代奴隶劳动力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第一次在“农业出口体系”中更加明确地显现出来。奴隶制的解体及后来帝国的覆灭（1889年，共和党也于同年建立）体现了这一新情况。同样，“传统城市中产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对“庄园主”们的支持也说明他们对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运作形式抱有希望。事实上，在奴隶种植业经济里，社会分工是有限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而自由劳动力的引入则意味着咖啡经济的社会劳动分工将更加广



泛，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将更加强劲。但直至 20 世纪初，这一过程并未对社会阶级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自废除奴隶制（1888 年）和共和国成立（1889 年）起，这些“新兴社会集团”的影响力就已经开始显现了。实际上，新的社会势力集团起初是由处于传统寡头阶层中次要地位的一些人和家族构成的，其中包括文人或军事官僚阶层（军事官僚在 1865 年至 1870 年的巴拉圭战争后得到壮大）；律师、议员、检察官或次要经济省份的地方长官等在国家统治阶层中处于受支配地位的角色。在废除奴隶制和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这些姑且称之为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与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主和南方一些非奴隶制生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排斥“帝国寡头”。在弗洛里亚诺政策^①出现后，当人们开始明确意识到“新集团”的存在时，爆发了反寡头政治的极端运动。此后不久，1891 年宪法确立了联邦共和统治形式，这种极端运动随之得以缓和。这一宪法代表了一种地方联盟体系，在该体系中，中南部资本主义农业出口商集团占支配地位，但并未将其它地区的农业出口商，尤其是那些生产率低下的农场主排除在外。后者在数量上显著下


^① 即 19 世纪 90 年代初巴西立宪运动时期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实施的政策。



降，这赋予了整个统治体系明显的传统寡头政治特色。事实上，自 19 世纪末起，对国家的有效控制权就一直掌握在中南部资本主义生产者和出口商手里，而非掌握在控制着低生产率庄园的“上校”们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缓慢多样化，这导致在上述集团的反寡头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新的角色，当时，城市集团（即自由职业者、公务员、雇员以及工人阶层）开始赋予这场运动新的含义。从那时起直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民众的诉求主要是通过少壮派军人运动来表达的。这些军人运动将社会团体的诉求，即军人的“公职”观念作为其行为和理想的基础，如果不把这种“公职”观念与前述反寡头运动联系起来考虑，就无法对军人运动作出客观解释。上述反寡头运动正是由处于边缘地位、经济上没落的地方寡头阶层发起的，尽管它们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却习惯于掌握权力。

寡头统治的危机在 1930 年革命中全面显现出来，它反映出统治阶层的地方联盟机制的脆弱性。这一政治联盟体系的损耗始于寡头集团间为争夺国家权力而进行的纷争。当某些地方统治集团为抗衡在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寡头面加强自身实力并扩大其政治联盟时，新的城市集团登上政治舞台即成为可



能。自1930年起逐步瓦解的统治机制，后来为一个不包括城市民众阶层的寡头利益联盟所取代。这些新的集团一登上政治舞台就立刻开始反抗旧的寡头联盟中的统治阶层（如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州的咖啡种植园主们），并寻求同他们就权力分配达成有利于自身参与的新的协议。

瓦加斯总统上台和自由联盟的建立就体现了这种反对咖啡种植业主霸权集团（该集团在1929年危机中受到削弱）的思想。自由联盟不仅包括南部畜牧业和东北部蔗糖业等地方集团，也包括“城市中产阶级”。尽管旧的统治阶级霸权集团反对这一联盟，但反对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他们政治上处于孤立，经济上受到削弱。

瓦加斯的政策开辟了新的经济基础前景。这一基础在不损害农业出口者阶层经济利益的同时，壮大了城市资产阶级，并促使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城市民众阶级联合起来。此外，短短几年后，瓦加斯在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权力联盟时，重新赢得了包括咖啡种植业主在内的部分旧统治阶层的支持。尽管新的联盟将农民排除在外，但逐步将城市民众阶层吸收了进来。在经济方面，瓦加斯的政策保障了就业水平，并通过加强国家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和政府调控，促进了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发展。

由此，中央集权政策取代了代表出口商阶层地



方利益的寡头—资本主义联盟。该政策在尊重地方农业出口者利益的同时，为工商资产阶级的出现提供了足够的城市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工商资产阶级的出现又导致新的“中产阶级”各阶层及劳工阶层的成分发生了变化。

3. 中产阶级参与权力联盟（乌拉圭）

当时的乌拉圭经济结构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其中至少有两个重要集团：一个是牢牢控制着生产体系的畜牧生产者集团，另一个是直接参与出口活动紧密相联的商业集团。为确保必要的收益，这两个集团保持着密切关系。有的商人曾经是畜牧业者，而有的商人改行从事了畜牧业，这类情况是司空见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斗争，其实斗争经常发生在政治舞台上。在各自立场的驱使下，畜牧业者试图更多地控制贸易，同样，商人也希望更多地控制生产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情形决定了传统政党白党和红党的组成。组成两党的社会经济集团基本相似，但各集团在两个不同政党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在白党中，畜牧业者所占比例大于商人，红党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常说，白党对国内事务有较大的影响力，而红党在对外事务中更有发言权。实际上白党主内、红党主外并不表明它们在指导基本经济



活动时有什么差别，而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白党在主导出口经济时更注重保护经济的生产领域（即农场），而红党则显然对商业更加关注，因而对发展对外关系更感兴趣。

这样的争斗常常引发政治危机，直至拉托雷军政府（1876年至1880年）时期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在该政权统治期间，两党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联盟，红党和白党政客在拉托雷政府中轮流登场。另外，自这一时期起，涉及经济利益的事务开始由农会组织和商会组织来处理。

拉托雷政府时期，乌拉圭同英国的关系相当密切，这推动了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此外，先进农牧技术（如报警畜栏、畜种改良等）的引入以及执行有利于吸引欧洲移民的政策等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加速了社会劳动分工，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得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化。

这一社会变化不久即显示出其政治重要性。中产集团和民众阶层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并成为支持旨在进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巴特列政府相关政策的重要社会依托。

从政党的社会成份来看，整个结构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巴特列主义的首要目标是在红党内部取得主导权，以便推动该党吸收中产阶级和城市民众阶层。下一步目标就是要掌握国家权力。为



达此目的，巴特列主义不仅要求民众阶层和中产阶级行动起来，还需调动全党及各个社会集团。这一战略布署在党内和国家范围内都取得了成功。于是，1917年宪法为上述新的城市阶层参与政治决策打开了大门。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政权具有脆弱性。巴特列通过中产阶级及一些民众阶层的加入而控制了政党，但又无法将其它阶层排除在党外；红党通过政党力量取得了政治胜利，但不能完全将白党排斥在权力之外。因此，政治体系的稳定并非由一个阶层或一个社会集团的权力来操纵，而由复杂的联盟机制及纵横交错的经济——社会权力的划分来决定。

政党间的联盟或协议构成了国家范围内的利益平衡体系，最重要的是形成了国家经济政策（国有化、财税体制、公共服务机构等）。这些政策不是脱离阶级而制定的，也不是某一集团损害其它集团的政策，而是体现了联盟的整体利益。

4. 寡头的主导地位和中产阶级的脆弱性 (哥伦比亚)

在哥伦比亚也存在着一种统治结构，其两党制并不表现为社会结构的水平划分，而是反映了统治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持久斗争，也就是商业和出口



商集团同与之相关的农业生产者集团之间的斗争。19 世纪的自由党—保守党之争大体体现了大地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确，支持保守党的既有传统家族，也有商人和安蒂奥基亚的农业生产者，他们在哥伦比亚的生产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19 世纪的自由党内也存在着两个集团，即落后的殖民地庄园主以及进步的烟草和咖啡出口商集团，他们代表了国家的两个不同阶层。

显然，激烈的政治斗争不但没有阻碍农业出口商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还时常促使相互斗争的派别之间达成妥协。保守的天主教派和自由不可知论者在财阀集团（该集团开创了重要的工业化经济发展局面）的压力下相互让步，体现了自由主义者拉斐尔·努涅斯思想的 1886 年宪法，都清晰地反映出同一阶级的两种对立意识间的权力妥协。

这样，在哥伦比亚形成了一个政治体系，它包容了统治阶级中最落后的和经济上最进步的各个集团，甚至使农村和地方中产阶级在同一秩序下得以共存。

自此，权力体系内部的争斗均以暴力形式出现（1884 年至 1885 年，1895 年，1899 年至 1902 年），且都未逃脱失败的命运。政治内耗不断加剧，直至国家体系呈现出无序化，当 1903 年巴拿马地峡从国家分裂出去时，这种混乱局面达到无以复加的



地步。

20世纪初，由于资产阶级加大了对国内市场的投资，使工业经济有所恢复。20世纪头25年中城市的迅猛扩张和当时社会分化的加剧导致了这一投资转向。由于初期的工业化和外国对石油及香蕉的开发，使“小资产阶级”队伍得以壮大并形成了城市和农业工人阶级。

面对随政治利益而变化无常的“寡头协议”，其它阶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表。然而，这一“代表”是较间接的，它是由反映民众诉求的统治阶级的“自由主义”派组成的，随着在巴拿马赔偿款刺激下实现的经济繁荣，他们也逐步壮大起来，并在世界危机前夕迎来其发展高潮。尽管工人罢工和联合水果公司及热带石油公司工人的要求常遭到武力镇压，却显示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多样化，并为哥伦比亚的政治变革创造了条件。

尽管如此，在拉斐尔·乌里韦上台之初，反映出新的社会分化的政治极化在自由主义框架内表现出来。人们发现，20年代社会主义集团的领导人几乎都来自于统治阶层。在40年代统治阶层内部出现政治分裂后，这些人在两党斗争中再次找到各自的归宿。在参与权力斗争的各集团中，有些集团并不属于统治阶层，加埃唐和加埃唐主义就是这些集团的典型和悲剧性的代表。在批判现有制度、试

图以暴力手段打破现有秩序的失败尝试，以及由政治体系内部开始的改革尝试等所有政治运动中，初期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存在和民众的抗议一直贯穿其中。社会集团的差别相对较小和寡头—资产阶级的霸权特性使中产阶级加入权力中心的努力受阻，并导致强制推行寡头协议，但是政治上的因循守旧并不一定带来经济上的停滞不前。由此可以看到哥伦比亚的特殊性。在情况相似的其他国家，除了拥有一个有分量的民族资产阶级外，还存在着中产阶级集团和民众阶层的影响力。而在哥伦比亚，发展是在控制着“民族阵线”的资产阶级的指导和推动下完成的。

5. 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工业化

不同的历史结构条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尽管经历了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其农业出口商政治体系仍得以保持稳定；相反在另一些国家，已建秩序却发生了变革。此外，也揭示了某些国家历史变革的不同原因和变革进程持续的时间。在这些国家中，城市工业阶层的迅速崛起加大了体制转型的难度。由此，便可以理解为什么1929年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既未出现出口体系的明显多元化，又未能形成一个面向国内市场的重要生产部门的情况下，哥伦比亚等国的出口寡头统治仍得



以维持。另一方面，对阿根廷和巴西政治危机的比较研究也证明两国存在着差异。

在巴西，不仅城市工业扩张所产生的劳工阶级不如阿根廷的那么强大，而且其统治阶级也相对更为脆弱。另外，在研究有利于非出口寡头集团的政治转型的可能性时也可以发现，巴西劳工阶级的影响力没有阿根廷的那么大。

这里要特别强调那些有利于巩固国内市场的政治条件的重要性，而且在对外扩张时期，社会分化比经济体系自身的分化更重要。由此，各社会集团达成的权力平衡构成了决定各国实现何种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

明确上述看法对更好地阐述我们下面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经济类因素在以工业化和国内市场的形成为主要发展特点的新形势下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本章已列举了一些为人熟知的例子（比如：国际市场的无序性，为应对出口危机而实施的就业保障政策，世界大战导致传统进口中止却未限制相应的出口规模等情况）。同时，1929年危机期间，某些国家的农业出口商集团根据环境变化，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一些传统经济政策，暂时或持久地经受住了经济风暴的考验，并得以重新适应危机产生的新环境。例如，国家组建代表出口商利益的行业合作组织（阿根廷），确保货币黄金价值

的货币稳定政策（中美洲），失业政策（智利）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出口商阶层认为在世界市场危机结束后，可能借助在国内市场有限扩张基础上形成的工业阶层（尽管这一阶层还只是出口经济的一个补充部分）来实现繁荣，有些国家也确实实现了这一繁荣。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国家采取了上述政策。

我们认为，1929年危机之后，国家发展的特点因政治体系的转型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转型是由于前述新兴社会集团的压力，以及出口体系相关集团的斗争所导致的。因此，由于各国统治结构不同，世界危机在各国产生的政治后果也不同。在某些国家，危机仅仅强化了农业出口商集团的寡头统治，并导致它们常常运用军事强权来应对因保护政策及生产行业吸收劳动力相应减少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在阿根廷就是如此，农业出口商集团很好地利用了1929年危机的影响并暂时加强了他们的统治。但就力量对比而言，农业出口商集团对外代表国家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遭到削弱，而中心国家的直接代表在政治斗争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


在其它一些国家，当统治体系由垄断寡头扩大到其它更开放的政治集团时，发展模式的转型加剧了。在此类国家中，经济危机与加强国内市场的政策及逐步打破寡头政治的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



关系。由于经济危机发生在工业化之前，因此说，工业化的选择产生于经济危机。与工业化思想相关的社会运动正是按此逻辑来解释工业化理念的。

现实中，历史进程各不相同，也不是如此机械化，即便在那些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亦非如此。只要考虑到政治规模，也就是说，只要分析一下从世界危机起，社会统治集团为推行其统治体系和规划生产进程而相互联合的方式，就会发现前面讲到的否定机械化发展的论断是有根据的。拉美国家不同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工业化推动力的匮乏以及外向型经济重要性的相对提高，都可以在“传统的”或新兴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加大其影响力的方式中找到答案。这些方式包括建立各种阶级组织（政党、国家机构、工会等）、倡导政治联盟以及为优化统治而采取的政治干预。为了理解在经济因素影响下社会发展的特点，必须探寻那些切实有利于政治统治集团利益的历史选择。经济因素对拉美地区各国均产生了相似的影响，所有国家均以类似的依附形式与中央经济相联系。

显然，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到外向扩张时期各国社会劳动分工复杂程度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尽管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及其影响力均受到制度性的限制。然而，对30年代的阿根廷和巴西西国经济生产结构划分状况所作的比较研究清楚地表



明，单纯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非导致强化国内市场和工业发展政策的主要因素，而只是相对次要的原因。阿根廷当时已有的生产结构较为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工业化政策比巴西的更为大胆。后者在 30 年代头几年建立起一个更有利于巩固国内市场的社会政治体制，而阿根廷直到 40 年代才具有同样的条件。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飞地经济

在一些国家，原则上讲，飞地是生产活动的主导者，此类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与其它国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要考虑飞地类型是矿业型的还是农业型的，还必须考虑到国家经济部门的差异程度，以及控制国家经济部门的各权力集团组建国家权力、确定集团间关系及其与受支配阶层和建立经济飞地的外部集团关系的政治进程。

正如前面指出的，拉美经济中的“飞地”经济发生在各国宪法出现之后，即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那时地方政治集团在政权中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并通过政权控制着经济要害部门。

各社会集团的活动都是在本国生产结构的框架内进行的，因此根框生产结构分化程度的不同，转



型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重要的是，从统治形式来看，存在飞地经济的国家，其统治结构直接显示出工人和农民阶层对统治集团的从属性。相反，在民族生产者占支配地位的一些国家，尽管政治统治与经济统治相结合，但经济关系更为重要。在飞地的统治结构中，正是通过政治关系使得经济开发成为可能。这样，国家统治集团不是作为“经济阶层”而更像是作为政治统治阶级而同外国企业相联系。相反地，外国企业却同工人和农民阶层建立起了直接的经济联系。由此，国家权力集团自身的经济脆弱性要求其保持一种排他性统治方式，他们与飞地部门的联系（对维持权力是必要的）取决于其保证集团内部秩序的能力，这种秩序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保障，也保证了与飞地达成的协议得以顺利履行。

另一方面，由于飞地自身的特点，在存在飞地经济的国家里形成了工人或农民较集中的局面，他们被排除在政治游戏之外。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表达自身要求的潜在愿望更加强烈。在这些条件下，中产阶级的加入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为了在排斥中产阶级的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必须争取“下层集团”这支突击力量的支持，而“下层集团”的支持可能会在整个统治架构中造成动荡；相反地，当国内经济出于某种原因而扩张且存在中产阶级参与的



可能性时，如果民众阶级也要求参与掌权，并为此施加压力，这样就会使得可能允许中产阶级参与的政策变得十分脆弱。

中产阶级参与掌权之前的统治形式以寡头明显的支配地位为特点。寡头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大地主，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市场在本地区或国内，其社会生产关系根据传统农场的标准形成，这种情形在墨西哥、委内瑞拉或玻利维亚都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对象基本上是农民阶层，其它阶层在生产体系中不占重要地位。因此，国家范围内的政治斗争在各个寡头集团之间展开。他们之间有斗争，但也常常联合起来对付其它社会集团。在此情况下，中产阶级还是可以通过与农民的联合共同反对寡头垄断政治，并冲破寡头阶级的排他性统治以实现其有限的参与，这是因为农场经济仍是国内权力的实际基础。当寡头更明确地成为控制飞地的中间人时，尤其当飞地是矿业型的时候，中产阶级便开始表现出一种民族主义姿态，并动员非农阶层共同反对寡头垄断政治。

历史上，在有些情况下统治并非是纯寡头的，而是或多或少地依靠资产阶级的参与。面对飞地，这些集团以政治上的让步为代价得以保持其经济和政治地位。资产阶级可以通过不同手段强化其作为经济阶级的特性，比如，他们既可利用商业和金融

阶层可能的发展（这在智利等存在矿业型飞地的国家比较明显），也可通过控制一些允许以更加资本主义化的方式开发土地的农业阶层（比如秘鲁沿岸的生产者们的行为）来达到此目的。

在此条件下，国内经济的发展还使得社会劳动分工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不仅中产阶级数量增加，而且还形成了城市民众阶层，他们与飞地和农场的工人和农民走到了一起。国家由此变得更加复杂，即不仅表现为如前所述的那种以农场为基础的最高权力形式，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推行更为复杂的统治形式的官僚阶层，通过这种统治形式，寡头政治集团和资本主义集团相对于飞地的利益得到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这一联盟形式有了更加复杂的职能，它不仅负责对飞地所缴税款进行重新分配，还具有推动国内经济活动的职能，尽管上述职能是有限的。同时，“中产阶级”中的主要阶层也作为一种补充形式加入到国家机器中。

从政治角度概括地说，在尝试参与权力的过程中，中产阶级遇到了各种极为不同的统治体系，这些体系主要由寡头和资产阶级阶层与飞地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同样他们也遇到了各不相同的被统治集团，如农场或种植园的农民，飞地的劳工（农民或矿工）和城市民众阶层，这些集团可以被动员起

来进行政治合作。不同的联盟产生了广泛多样的政治选择，如民众可以利用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作为其中一个集团的盟友而参与权力体系（智利的某些时期）；部分农民和工人阶层的革命尝试（秘鲁）。

最后，在特定的情况下，庄园主集团可以将其经济活动转向土地开发，这样就在并不一定形成一个工业化城市经济的情况下结束其农场体系。在此情形下，未被飞地经济或国家资本主义农垦经济吸纳的农民们被迫投身其它农业经济形式以维持生计，如引发中美洲资本主义农业扩张的农业经济形式，它表明社会劳动分工不足决定了中产阶级的规模在缩小。只有在飞地和出口经济能够成功形成一个足够大的服务部门来吸纳他们的时候，中产阶级才能参与权力；相反，就要动员农民来反对统治体系。在此形势下的另一选择就是国家农业阶层必须缓慢转型，这种转型使土地得以重新分配，由此可能产生一个农村中小地主阶层，正如在哥斯达黎加所发生的情形，尽管其规模十分有限。

1. 中产阶级在寡头统治的衰落中参与权力体系 (墨西哥、玻利维亚、委内瑞拉)

在一些国家，寡头统治以矿业飞地和非常传统的土地关系为基础，中产阶级只有在农民和民众支持下进行革命才能有效地参与权力，如墨西哥和玻



利维亚，而委内瑞拉的情况则更为激烈。

这一进程在前两个国家各具特点，这不仅因为有历史时间上的差异，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两国农民阶层在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墨西哥，矿产开发是发展的基础，而且同国内交通和能源一样，都掌握在外国资本的手里。全国总投资的 40% 来自美国，80% 是对矿产、石油和铁路的投资。

尽管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和金融业阶层）以某种方式参与政府，农场体系仍维持着国内统治；由于政权的专制特点，参与国家行政管理的城市中产阶级无法有效行使其政治使命。

可以说，参与政权的中产阶级是由寡头挑选的。中产阶级要想有自己的代表，就必须建立一个选举机制；农业寡头的抵制使得中产阶级只能与农民结盟建成统一“军团”，并通过革命运动的方式与寡头剥削机器作斗争。

城市中产阶级通过革命实现了他们的短期目标（“反对连选和提倡有效选举”），同时，尽管存在一定困难，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求与农场主在平等的基础上结盟。马德罗政权建立后，革命时期的一些显赫人物能够留在政府中，这并非偶然。从某种程度上讲，卡兰萨的政策是这种联盟最好的表现方式。但是在革命进程中形成了农民组织和工人组织，以



及一种强烈的意识，即正是他们“完成”了革命。中产阶级和农场主的这种联盟一直维系到1929年危机。另一方面，革命并不意味着对外国资本依赖的结束。农民和工人的抗争更加强烈，这就导致了政权不稳局面。在此情况下，城市中产阶级必须作出抉择：要么保持联盟共同对付民众阶层，要么改变战术。1934年，卡德纳斯政府改变了政策，他选择了民众阶层作为盟友，这有利于更有效地进行土地改革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会机器。另外，卡德纳斯政府开始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石油国有化。这样就向保证政府获得民众的有力支持迈出了第一步。这种体制的初衷不仅是要让中产阶级对国家实行部分控制，还在于要着手建立一种与国家权力平行的私有制经济力量。

在玻利维亚^①，寡头的政治衰落始于查科战争的失败。这场战争首次表明土著居民可以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第一次使人们认识到土著居民的处境。另外，在中产阶级中开始出现一些不满寡头统治的集团，主要由参加查科战争的年轻军官、大学学者及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政治

^① 有关玻利维亚革命进程及此前的社会状况，请参阅《当今拉美社会变革》一书中第108页以后的内容。即理查德·W·帕奇所著“玻利维亚：美国在革命中的援助”部分。



集团组成，他们以各种方式谋求取而代之。

这些集团可以找到盟友，以有效加强其实力。比如与锡矿工人的联盟导致民族革命运动爆发。应该注意到，农民运动一开始并不包括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但自 1936 年起，农民运动开始向革命运动演变并逐渐具有更加激进的政治内涵。

代表比利亚罗埃尔政府的军人—民众联盟扩大统治结构的尝试失败以后，在实现推翻寡头和飞地体系的新目标的过程中，首都民众的参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前面提到的中产阶级集团和锡矿工人也站在了民众一边。所以，此后的政治均与矿业国有化相关。城市—矿业极端主义似乎在原则上不会插手农业问题^①。然而，前面提到的农民运动却凭借其自身动力将土改改革问题引入中产阶级参与权力的进程中来。农民集团尽管没能有效参与对权力的划分，却在 1953 年革命后对中产阶级的民众城市政策给予了重要支持。

在委内瑞拉，随着军政府的建立，各地区寡头之间的斗争达到高潮。军政府尽管没有损害地方寡头权威，但也不允许它们为争权夺利而继续相互

^① 有关土地改革与玻利维亚革命间的关系，请参阅，弗拉维奥·马奇卡多·萨拉维亚著《土地改革批判：玻利维亚案例的理论诠释》，圣地亚哥，智利大学经济学院出版社，1966 年出版。



倾轧。

军政府时期，与石油开发公司达成的协议得以履行，这改变了委内瑞拉的传统局势。城市阶层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稍成气候的中产阶级，而另一方面，石油飞地又孕育了重要的工人聚集点的早期雏形。

为推翻政权，中产阶级组成了一个以城市中产阶级和石油工人为基础的反对派。由于没有举行选举的可能性，这个联盟对统治体系构成的威胁是相当有限的。于是，他们不得不使用多少带有暴力性质的其他手段。但实施这些手段在当时也是困难的，因为中产阶级在城市，而支持他们的工人（马拉开波湾的石油工人）却离城市中心相对较远。而且，由于国家将石油收益在首都加拉加斯进行重新分配，因此工人阶级获得城市民众阶层支持的可能性也随即减少了。

中产阶级的其余选择就是利用权力体系内部矛盾，尤其是利用各军事集团间的摩擦和争斗来尝试发动国家政变。梅迪纳·安加里塔将军以承诺恢复民主为条件，获得了民众支持并发动了军事政变。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实现了这一选择，这样就打开了选举之路。通过这一途径，代表中产阶级和石油工人联盟的民主行动党执掌了政权。他们开始采取措施，进行土地改革并设法从石油飞地获得更多收益，以此改变传统势力的基础。尽管如此，民主行



动党的执政是短暂的，在为推翻前政权而发起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军人将他们赶出了政府，并与佩雷斯·希门尼斯组成了一个具有专制色彩的、由石油飞地收益供养的政府。


佩雷斯·希门尼斯政府时期适逢石油出口高峰，委内瑞拉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而且，在那个时期，除投资石油业外，外国资本在国内市场的商业和工业活动中也有着重要影响，由此，一个不完全依靠国家而拥有自身抗争能力的民众阶层应运而生。这样，反对派基础的扩大便成为可能，这时的反对派由中产阶级、城市民众阶层和石油工人组成。因为有了农民的支持（至少是心照不宣的支持），造反的可行性增加了。这要归功于民主行动党，是他们在其短暂执政期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并明确划分出农民阶层。

但外国资本已经不再局限于石油业，当其投资方向发生政变时，一些中产阶级也可能以某种方式投入到新的活动中，于是出现了不同集团间的严重冲突，其结果是联盟面临解体的危险。

2. 中产阶级参与寡头—资产阶级统治体系

（智利、秘鲁）

在智利，国家权力及飞地收益均掌握在地方寡头和金融商业资产阶级手中，后者不仅控制着重要



的经济领域，还以小合伙人的身份与飞地经济联系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外国矿业开发公司的监理商。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不仅将从事自由职业或公共服务的中产阶级推上了舞台，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无产阶级，他们要么与飞地经济直接相关（如硝石矿工人），要么在港口或交通行业工作。手工艺者等尽管不属于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化城市民众阶层，也以某种方式通过上述几个集团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国家各统治集团尽管共同分享权力，但并不意味着相互间没有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从根本上影响了飞地和与之直接相关的国家集团，然而地方农业寡头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冲击。由此产生的权力失衡要求进行权力再调整。可能性之一是，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脆弱性的集团与新的社会阶层结盟，以某种方式将后者吸收到权力体系中。事实上，他们与城市中产阶级结成了联盟，并通过选举途径将中产阶级吸收进来。选举制度体现了新政治平衡的合法性，因为当选者不仅是“国家一部分土地的主人”，而且也是“选票的主人”。这一联盟使城市中产阶级得以参与国家政权，并享受飞地经济的收益。在最开始的阶段，中产阶级的政策并不怀疑飞地经济具有优势，因为他们所关注的并非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基础以使他们获得某种自治，



或者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现有的国家经济集团进行竞争，而是致力于建立一个由他们来管理的国家。

城市中产阶级参与权力还意味着民众阶层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但对于他们来说，中产阶级入阁、选举权等等不过是一些政治要求，工人阶级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或许正因为此，尽管在某些时候新的政治协议必须依靠民众的支持，但阻碍民众阶层成为永久的、不受猜疑的盟友的阴影却总是挥之不去。不稳定的经济体制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政治计划无法得到解决。这反映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尖锐矛盾，也揭示了其与民众阶层长期存在的问题。

由于寡头本质上是通过议会体系进行统治的，因此在非常时期，他们往往诉诸武力这一极端行动来确保对国家的必要控制，此举加强了行政权力，而起初是通过新兴中产阶层施加压力来强化行政权力的。

飞地出口经济危机（尤其是 1929 年危机）打破了由于中产阶级的出现而带来的脆弱平衡。旧的体制缺乏必要的活力来消除失业，当然在危机发生之前，从没有人费心去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结构。因此，必须求助于一些缓冲手段，比如修建公共工程和其它一些经济活动以减少危机的冲击。但这些政



策均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它们意味着巨额开支和财政赤字的增加，这是资产阶级和地方寡头都不愿意看到的。同时，另一方面，经济举措也很难缓和被失业或潜在失业所激化的民众的不满情绪。

在纯政治行为方面，总的来说是既求助于激进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压力，又求助于工人的有组织运动。没有人愿意维护连重新建立与地方寡头的联盟都办不到的政府。同时，各传统统治阶层间的斗争也没有停止，这使得在短短 12 天内建立一个过渡性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可能。

实践中，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概括来讲是传统阶层重新结成政治联盟，将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其中那些不太激进的阶层吸收进来，而将其它的阶层排除在外。

之后的经济政策更加具有现代特点，但显然还不是民众主义政策。如果政府试图运用通货膨胀手段来减轻危机的负面影响是因为它被视为一种可以将债务转嫁到国家农业、工业等经济集团头上，由其共同分担债务的方式的话，那么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则使得通膨手段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暴力以及左派和右派武装民兵之间的斗争变得日益白热化。但随着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被逐渐克胀，城市中产阶级又有可能重新参与国家政权了。



当经济冲突得到缓和时，民众也可以制订他们的“政治计划”并接受一个重新分配方案。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冲突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民众组织。这一组织使民众从劳动大众转变为权力盟友，他们通过 1938 年组建的人民阵线实现了权力参与。

现在，城市中产阶级回归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有了另外的意义。为巩固政权，需要建立一个经济基础。政府可以成为中产阶级管理下的工业经济的支持者，也可以成为中产阶级与商业—金融资产阶级（此时他们不再仅仅是选民力量，而且是进步资产阶级了）相联合的中介。

关于转型时期的秘鲁，要看到除了传统农场主外，还存在着一个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其重要性使之足以构成统治体系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但也不能忽视种植园里的雇农阶层和城市民众阶层的存在，他们对权力体系施加影响，并使局面更加复杂化。

强权是那个时期秘鲁人民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事实，部分原因是各统治阶层间的冲突十分尖锐。中产阶级一直在两种选择中左右为难：一种选择是作为小合伙人与资产阶级中更具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阶层结成联盟，不管他们是城市还是农村资产阶级；另一种选择是与民众阶层结盟。当时的阿普拉

党的纲领更倾向于后一种选择，但这显然不是惟一选择。在中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众运动也可以选择一种更加专制的“民众主义”，比如彼罗拉、莱吉亚和桑切斯·塞罗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都进行过类似的尝试。

集团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导致存在着多种联盟的可能性，这是统治体系自身的一个弱点。一些政治开放计划，包括或多或少试图通过暴力推翻旧有机制的尝试均遭到镇压，而且政党也因此是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禁止参加选举。这就解释了军人政权或深受军人影响的政府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出现的。他们掩盖了寡头—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同民众压力进行对抗。“中产阶级”的力量受到削弱，甚至他们与民众阶层的联盟也变得脆弱起来。他们试图与现代集团或最传统的集团联合起来，共同开辟通往权力之路。大体上可以说，中产阶级开始打算放弃民众的支持了，因为权力之路被与飞地结盟的资产阶级和军人牢牢把持着，中产阶级依靠民众的支持永远无法获得权力，剩下的选择只有利用统治集团间的不睦来谋求其参与控制国家机器，并通过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盟在国家机器中占据一席之地。如此复杂的战术使得中产阶级加入权力行列的进程难上加难。统治集团会排斥一个可能暗地里受到民众意愿影响的盟友，因为它的存在可能会破坏现行的统治



架构，于是他们倾向于维系现有的权力形式，尽管不是“民主”的，但至少能保证统治体系得以维持。再后来，当一些现代类型的商业—金融阶层开始重新重视民众的支持时，统治集团间联盟的内容和含意就都发生了变化，这一态度发展成为最初的“贝朗德主义”。尽管有失去部分民众支持的风险，中产阶级尤其是“阿普拉党人”现在仍要寻找“奥德理亚派”这样在传统权力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团体作盟友，这些盟友从前都是保守派的代表。

3. 面对大庄园主和飞地的中产阶级（中美洲）

整体上讲，中美洲的农业寡头转变成了农业出口商集团。如果说这一进程超越了农场式生产体系，却没有引起重要的城市工业活动。仔细研究这个转型过程，我们对该地区各国特点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可以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①。

自独立起，中美洲的出口经济一直是与一些殖民地产品相关的，特别是从动物和植物中提取的染料，而农牧业在国内生产中也保持着一定规模。经

^① 有关中美洲发展进程的社会学研究请参阅埃德尔韦托·托雷斯·里瓦斯著《中美洲发展的可能性与模式》，智利圣地亚哥，学院出版社，1966年出版。有关中美洲经济发展状况，请参阅卡洛斯·卡斯蒂略著《中美洲的发展和一体化》，纽约，普莱格出版社，1966年出版。



济结构在社会结构中得到显著体现，与染料出口相关的商人阶层由于控制着整个农产品生产的贷款，他们在国内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简言之，这些原料的生产基本掌握在小生产者（小地主）手中，这为商人的统治提供了便利。

但经济不仅局限于染料，大地主仍保持着农场式的开发，集体农庄占有商积相当可观的土地，教会地产或者称之为“死人手里”的地产也不少。

始于1870年左右的咖啡经济改变了这一状况。大地主对咖啡的开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咖啡种植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随着咖啡经济高潮的到来，出现了“自由政权”，它推动了土地私有化进程，集体农庄、教会以及很多小农庄由此都转变成了私有地产主，他们掌握的土地也随即成为大地主的私有地产。

在这一时期，咖啡种植业者相对于商人集团处于支配地位，他们主要通过国家银行建立了自己的信贷系统，这样就不再依赖于原债权人的贷款。于是，他们开始着手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是铁路的建设。

再后来，香蕉飞地在美国资本的控制下形成了。其时正值美国对外扩张政策迅猛发展、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时期。种植香蕉的企业暗地里垄断着铁路和水果运输码头。当咖啡经



济受海外市场影响出现明显下滑的时候，香蕉经济及时出现，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收益没有超过出口咖啡的利润，我们计算一下两者的价格就更清楚这一点了。

获得对交通的控制权使“种植园”的重要性，也就是飞地的重要性更加明显。

1929年危机导致了中美洲出口的减少。在某些地方，由于农民可以转移到经济中的其他领域，对危机没有造成巨大冲击。尽管如此，其影响是持久的，直到四十年代最后几年经济才开始复苏。

危机清楚显示了统治的特点。在萨尔瓦多，因饥饿而起义的3万农民被处决，这显示出统治体系是建立在与飞地利益相联系的大地主阶层支配农民大众的能力的基础上的。农民大众提供的极为廉价的劳动力，为这些阶层带来了巨额利润。

那一时期接连出现的强权政府显然是统治集团在不利条件下努力控制局面的手段。

中美洲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受到了压制，他们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要求政治参与的愿望可能间接导致爆发农民起义，而寡头们却不愿进行革新。中产阶级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忍受与寡头和飞地相联系的集团的绝对专制统治，而这只能维持其相对于农民的有限支配地位；要么就展开一场旨在获得更多参与的政治斗争，但必须承担斗争可能失控的



风险。

危地马拉的革命证实了我们的论断。土地改革引起了强烈反应，阿本斯政府倒台之后的几届政府都企图复辟旧体制。直到农业经济（主要是棉花种植经济）中的一些与掌权者相关联的部门开始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最后几年，中产阶级参与政权才成为可能。棉花种植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海外需求，具体说就是依靠美国市场。由于引进了新技术，该种植业已不再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这为城市的发展及城市功能的加强创造了条件，尽管城市功能的加强仍离不开土地的开发，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保留数量庞大的农民阶层。另一方面，工业持续萎缩，因此，通过工会形成民众压力的可能性还远不能实现，而且工会的活动通常是短暂的。在这些条件下，中产阶级得以有限参与政权，同时，本国及外国出口商控制的专制统治的总体架构得以维系。

4. 中产阶级、工业化和相关政策


总体来说，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相对脆弱性，飞地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各个国家仅拥有初斯的国内市场。在此类经济所有可能的发展形式中，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才会考虑实行旨在扩大国内市场，即有利于工业化的政策：第一种情况，例如在智利等国家，已经存在一个重要的商业—金融阶层，并



由此形成了一个有能力要求为经济扩张建立民族基础的中产阶级，这时，外部势力也会要求推行工业化政策：第二种情况，例如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在这些国家，中产阶级得以通过革命手段参与国家机器并利用它来发展民族经济。

不管怎样，各中产集团的影响为国内经济增添了活力，他们有时与已有的资产阶级结盟，有时与民众阶层或农民阶层结盟，有时又与两者同时结成联盟。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国家，世界经济危机对现代部门（飞地）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并未威胁到寡头在其经济根基即传统庄园里的统治基础。尽管如此，“就业保障”政策和资本本国化政策的实施无法弥补飞地部门的收缩，就像在一些存在民族生产者的国家中发生的情况那样。相反，世界危机引起的失业使得政策的制订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社会环境。30年代，社会压力增大，罢工增多，客观上导致了更加激进的政策形成。例如，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主义”、智利的带有激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进入了最具革命性时期的“阿普拉主义”（以特鲁希略起义为标志）、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的建立、萨尔瓦多农民起义、农民参与人数最多的桑迪诺武装起义，同时还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社会主义”尝试等。




民众通过部分城市中产阶级表达其意愿，而寡头和飞地的统治者则以专制的方式，即使用武力作出回答。基于这些条件，国内市场政策显然必须先进行政治变革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正如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以及秘鲁后来所做的那样。“转型”（指中产阶级参与政权）产生的经济后果与某些情况下中产阶级中最具特权的集团向初期资产阶级转变之间没有关联，这一观点可以在一些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民族出口经济国家中得到印证。显而易见，与寡头或飞地相联系的阶层的倒台或衰弱是先决条件，这样才能利用至少是部分掌握在这些集团手中的国家机器来创造一种积累和投资机制，以最终建立起国内市场，这一进程本身将成为新政策的支撑点。

然而，不要以为从这时起这些国家又将重复上个章节研究过的那段历史。在那一章节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出口商阶层控制政权的国家中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同时，要求实现发展的民众主义未能找到其政治基础，在存在飞地经济模式的国家里，工业化资产阶级的形成或多或少取决于国家的支持。

此外，权力体系重组后，地位上升的中产阶级和国家资本主义阶层（他们形成于革命进程中，或在中产阶级加入政府之前就已存在，比如在智利甚至在秘鲁也以十分有限的方式存在着）在国家的支



持下，借助一部分由飞地收益带来的资本，开始着手改变发展的内容以加强城市工业部门。这一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有条件的国家得以实现（该进程在智利是个例外，它发生在二战以前）。对外依附关系的类型此时已经发生了变化，后面的章节将就此继续进行论述。大约自 1950 年起，外国资本也开始投向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领域，这一转变要求国家实行新的限制政策，并为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第五章 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 国内市场巩固阶段的社会力量和发展主义政策

由于存在着对外依附的不同情况，拉美各国的社会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转型期”中所表现出的突出特点，或许是由城市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以及城市中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参与权力体系的能力日益增强所决定的。

这一社会状况在经济上通过加强国内市场政策和工业化表现出来。显而易见，正如我们已提到过的那样，在出口经济由民族集团控制、并在对外贸易危机发生之前就已建立起一个重要的工业部门的国家中，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呈现出更加自由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是基于私人企业的活力之上的。另一方面，在存在飞地经济的国家，国家“领导主义”则是通过那些与进出口体系无直接关系的集团建立其城市工业经济基础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在后一种情况中，某些国家的国家机器可能成为形成一个工业阶层的工具，而这一工业阶层逐渐与公共企业共同承担起企业职能。总之，必须强调社会分工是存在的，即便在较自由的国家，国民经济即便大多由国家指导，但也不乏私营部门的参与；同样即便在工业化初期，公共部门也参与了这一进程。相反，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的特点则表现为存在着两个同步进程：其一是私人经济实现了扩张，工业资产阶级也随之日益壮大；其二是开辟了一些新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而这些领域正是国家投资较多的领域。

在开始建立新的经济发展基础的国家中，其结构性特征是社会劳动分工的广泛变化必然给人口——生态等领域带来变化。这在社会领域表现为形成了无产阶级和城市民众中的非劳工阶层。这一非劳工阶层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工业化所能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的消化能力，使得在拉美可能形成所谓“民众的城市社会”，这正是经济未获得充分工业化的结果。

随着多样化工业经济（即不仅仅生产必需消费品的工业经济）萌芽的初步形成，正是“民众现象”赋予了所谓“内向发展”阶段初期以鲜明的特点，这一阶段始于二次大战期间并在1950年至



1960年间完全形成。由于缺乏外汇和进口面临困难，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被称为“替代工业化”^①的经济政策，它旨在利用并扩展原有的生产基础以满足国内对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需求。在这一时期，国家的作用显著，其特点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国家从前通过行使对外融资政策的媒介职能而从根本上反映了出口商和大庄园主的利益的话，那么，现在则通过关税等必要措施，开始将出口收入转向国内并建立基础设施来保障替代进口工业化进程，从而起到了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由此出现了钢铁、炼油、电站等国家建设项目。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措施只在某些国家被采用，因为它们是“转型阶段”权力联盟的结果。现在看来，这一工业化最初并非是典型工业资产阶级逐步或革命性发展的结果，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征服者”的利益和愿望，但更多的是体现了从农民到城市民众等众多阶层间进行政治妥协的结果。工业化政策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制定适当的经济措施，它既能建立从转型时期起就已分享权力的新兴集团的经济基础，也能为数量可观的民众阶层参与社会经济提供机会，因为城市民众阶层的失业或不满可能

^① 请参阅玛丽亚·达·康塞桑所著“巴西进口替代进程的高潮和衰退”一文，1964年《拉美经济通讯》第九卷，第一期。




会给统治体系带来变革。这样，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工商、金融阶层）以及包括与生产率低下的大庄园相关的部门在内的旧的进出口部门都被包括在统治体系内。

社会政治斗争在替代工业化时期的主要表现是，各种社会力量能够达成反映新的权力平衡的协议和联盟。无论是农业出口和金融部门，还是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业部门都参与了这场权力争夺战。另一方面，所谓的民众阶层（由工人阶级、城市平民和农民组成）也在斗争中崭露头角，他们有时被当作统治的对象，有时又成为统治的基础。

各国的社会力量通过不同方式获得权力。一方面在各国产生了共同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却使得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形式、组织和控制权力的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不同，这些差异又导致了与国民经济和社会构成模式密切相关的各国替代工业化政策不尽相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根据飞地经济的存在与否，国家的作用和企业集团的特点在转型期的表现是不同的。另外，当“民众现象”具备影响统治方式的能力时，不同国家民众的特性也有区别。

在系统性论断形成之前，可以大体上认为，标志着国内市场巩固阶段的主要特征，正是那些在这一时期的总的经济形势和指导方针中存在的发展的



根本性问题。

以下两种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方针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条件：一种是服务于“参与”的指导方针，它产生于民众的压力并为经济和社会“分配主义”开辟了道路；第二种与第一种同时存在，它反映了新的统治集团的利益，他们希望继续进行旨在发展国内市场的经济扩张，以延续统治体系。后一种方针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主义”，并使民众“融入”生产体系和不同程度地“融入”政治体系成为可能。这样，就在“发展主义和民众主义”之间建立起一种重要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各种利益，即扩大消费和加速投资的矛盾，以及国家参与和加强私营城市工业部门的矛盾。

“发展主义的民众主义”（如前所述，包含相互矛盾的目标）以及类似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它旨在达成适当程度的共识并使新的权力体系合法化。国家通过这一权力体系支持一项可以为所有人谋福利的工业化规划。据此，国内市场的建立取决于以下因素：

- （一）是否拥有用于国内再投资的资金；
- （二）是否拥有工业化所需的外汇；
- （三）尚不充裕的收入再分配的可能性，以允许民众有限参与的可能性；
- （四）公共和私人企业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




能力；

(五) 国家行政机构是否能发挥最低限度的作用和职能；

(六) 能否加强政治领导，以协调相互对立的集团间的利益，使他们在国家利益下实现和解。

总的来讲，出口部门往往控制着资本和外汇，这使工业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和劳工民众阶层必须行动起来与出口部门进行斗争，以便在发展国内市场方面取得成功。然而这一斗争的成效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国际市场价格有利于实行维持出口产品价格的政策，这给出口商们带来良好的收益，它同时又有利于保持某种程度的汇率稳定，这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另一方面，保持工业部门和劳工民众阶层间的“发展主义者联盟”，也取决于是否能保持旨在保证工业投资规模的海关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损害农业和传统中产阶级集团的利益，但有利于工业投资，从而即使不能保证工人实际工资得到明显增长，也至少可以使参与工业体系的民众的数量得到增加。

因此，那些一直控制或试图控制资本积累来源的社会集团与公共机构中的社会部门之间，为重新制定价格和税收政策，以实现私人或公共企业的资本化面发生了冲突。



历史的经验将决定如何具体协调这些工业化的条件并为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提供蓝本。所以，只有本着大胆假设和对历史负责的崇高思想，我们才能在本章节中探讨所谓“平衡不同利益的模式”。

从前面的研究中能够推断，工业化政策的不同特点取决于采取何种方式调整或协调国家的作用和工业资产阶级的作用。国家作为统治的载体，其行为不仅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促使各社会集团的行动服从国家意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民众的参与在此阶段已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一方面是工业化进程的必要条件（不仅作为劳动力，而且还是消费市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们的支持与否也是权力集团所不能忽视的。

无论是在飞地经济国家，还是在民族集团控制生产的国家，工业资产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表现出以下几种典型形式：

（一）“自由的”工业化，即由私人企业直接领导和实施的工业化。显而易见，这种工业化政策的前提是原来存在一个强大的并处于霸主地位的农业出口部门，它以某种方式与国内市场相联系并将部分资金转向工业领域。

（二）“民众主义的民族”工业化。这种工业化

是在资产阶级以及与权力体系（国家）相联系的中产阶级和民众阶层（工会）等强势社会力量的政治愿望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些社会力量与农业进出口部门程度不同地共同掌握着发展进程的领导权，尽管两者之间仍存在着斗争。

（三）由“发展主义的国家机器”领导的工业化。在这一工业化进程中，国内进出口资本主义部门在资本积累和引导资金转向国内市场等方面表现得软弱无力，而国家却运用其不太积极的体系成功调整了投资方向并巩固了工业经济的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飞地国家。

显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各国的工业化都取决于经济集团的投资、消费决策和将投资引向国内市场的决策。除此之外，就是工业化的社会影响导致的各集团的广泛“参与”问题。而正是这一问题使得“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在协调各“发展中”社团的利益并把它们组织和团结起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努力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权力体系的过程中成为主旋律并发挥着最重要的指导作用。

实行工业化的国家在历史结构方面的差异，给各国的统治集团和民众阶层带来不同的影响，这使


得不同的国家建立经济的工业基础的目的也不尽相同^①。

第一节 民众主义和自由企业经济

这种情况在阿根廷最为典型。正如我们所见，无论是外向发展阶段还是转型时期，阿根廷都存在着一个充满活力的、牢固并占霸主地位的农业出口企业阶层，其统治体系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地方集团。

当国际市场危机的影响开始显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工业化有利条件形成的时候，不仅已经存在一个通过金融体系与农业出口部门相联系的工业资产阶级，而且也存在着一个参与政治斗争并有能力运用选举手段（通过激进党）动员城市民众的中产阶级。此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利奥这样的大城市里，还存在着一个要求参与政府的工会化的劳工阶层，他们主要通过总工会与社会主义政党等相联系。

^① 在后面几页中我们提及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要么其工业化进程具有典型特征，要么其特点鲜明地反映出不同选择的可能性。



的确，正如我们所说，出口部门的活力和成功不仅导致建立了一个依附于出口的工业部门，还使得金融出口部门的建立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经济发展是在这些集团的控制下取得的。在利用良好的国内市场前景（这种看法主要源于对世界危机后，特别是二战期间的总体经济形势的预测）来实现受上述集团控制的经济扩张时，政治问题激化了，同时还存在着来自工会及带有“伊里戈延主义”思想的中产阶级激进派的压力。当时（1944年至1945年），阿根廷试图在政治上建立一种与欧洲和拉美（比如智利）的人民阵线类似的政治组织是不足为奇的，这个尚来实现的目标突出反映了阶级间的政治对立，即资产阶级式的统治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

由此，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增加，不仅经济扩张所必需的劳工力量日益壮大，反对民众政治参与的势力也逐渐增强，这使得阶级统治（包括对反对派的排挤）与经济活力之间的斗争走进了死胡同，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的专制体系和旧的劳工阶级的工

会组织结构同时破裂^①。此外，导致工会体系破裂的另一个原因是，该组织结构并未很好地代表新的劳工阶层的利益（因为新成员的加入虽然扩大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基础，但另一方面又使得工人阶级已经获得的某些经济利益面临丧失的危险）。

庇隆的民众主义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即在尊重私人企业自身动力并保持经济扩张的同时，领导私营企业加速推动民众的经济参与和社会、政治参与。这样，国家恢复了仲裁阶级斗争的职能，并通过行使这种职能在企业阶层和城市民众内部进行收益再分配。

除了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长期存在反对外国势力的要求，以及在经济上强调工资待遇要求之外，各方的冲突（主要是工人大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在形式上更多表现为民众与“寡头”间的对立。

那么，为什么寡头和民众间的对立会成为调整政治领导权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呢？

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强大的农业进口部

^① 有关这一进程请参阅希诺·赫尔马尼所著《转型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和《从传统社会到民众社会》两书，布宜诺斯艾利斯，PAIDOS出版社，1962年出版；托尔夸托·迪·特利亚所著《阿根廷政治体系及劳工阶级》，布宜诺斯艾利斯，EUDEBA出版社，1964年出版。



门，其领导权表现为这一部门与从属于它的各农村阶层之间的联盟。这些农村阶层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即与出口部门无直接关系的大庄园主集团和与出口有关但并不控制出口的各阶层。就阿根廷而言，农业的资本化程度决定了第一类农村阶层是次要的而第二类却是主要的。在第二类农村阶层中除了存在一个与商业集团无关的粮食部门外，还包括国内市场的表业生产者和典型的“农村资产阶级”，后者与农业出口无关，但随着出口经济的多样化，还包括畜牧部门。另外，统治集团主要由与进出口部门有关的外国企业构成，其垄断程度不断提高。

在经济和政治上均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出口统治集团有着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们通过向国内市场进行投资而成为充满生机并信奉发展主义的阶层；另一方面，由于其与外部的联系而成为依附关系的媒介。这样，代表庇隆主义的新“权力组合”便可能有效协调经济主导部门的利益和不断增长的民众“参与”的利益了。这种可能性是二战以后的有利形势的结果。当时，由于积累的增加，有可能改善工人大众和中产阶级雇工阶层的工资和社会条件，并且在基本不损害原有经济统治部门利益（即受统治核心控制的农业和城市“传统中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加大对工业的投资。政治术语称之为“寡头”的各阶层本来不仅要为新的“权力组合”

不断付出代价（这将蚕食有利于出口经济的积累），而且要承受反对派对权力体系的政治批判，尽管他们从前实际上是从属于这一体系的。

在发展进程中，这种庇隆主义的权力组合无论是在投资决策还是在消费方式方面都表现出独特的特点。

的确，在投资决策方面，工业化是在两种互为补充的因素下进行的。一方面，进出口和金融部门以其可承受的工业转型的方式调节着工业化发展动力，这一举措使快速而广泛的进口替代政策明显受到制约，至少使那些由统治阶层控制的产品进口明显放缓；另一方面，与农业进口集团无关的旧工业部门则通过扩大替代工业化的范围和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这是其由来已久的薄弱环节）来扩张其经济基础。上述两方面都将国家视为主要机构，但都从自己的角度来定义国家职能。在第一种情况中，国家仍然控制着汇率制度和海关税政体系，这两者是“平衡”工业利益和农业进口利益的主要工具；在第二种情况中，不仅海关关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国家还具有大量贷款和快速融资的职能。


因此，在这种发展模式里，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不足以迫使国家从一个规范经济的工具转变为一个直接进行生产行为的工具，因为即便在生产体系中并未形成公共生产部门，旧的经济基础仍使得私



营部门得以继续推进国内经济分化进程。这也就是说，为建立工业经济，私营部门的积累仅仅要求国家通过其自身的投资渠道进行利润再分配，而私营部门的活力则为城市民众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以适当的节奏将他们融入经济体系中。

实际上，这种发展模式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因为有足够的资源维持工业化，而且由于经济活力使得农民能向工薪阶层转变。当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后，经济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又明显加强了其容纳移民的能力。当然，城市化进程一直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强大压力，但这一压力并不谋求通过建立国家生产基础而掌握经济的决策体系。当要求重新分配的压力使国家采取直接的经济行动时，这一压力最终使私营部门得到加强，并在资产阶级和新的国有企业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

民众的存在起先是当它为成为社会的平等一员而施加压力时才引起社会关注的，他们在自身权力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承认旧的体系为推进工业化进程所确定的游戏规则。民众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和承认劳动者权力的压力是强大的，但这种自然而然的政治压力并不排除在新的“权力组合”中各集团利益相互交织的可能性。民众（他们更多地被视为雇工阶层，而不是受压迫阶层）运动多以工会形式出现这一事实，说明他们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



种既有利益对立又有利益一致的政治关系。这两个阶级十分活跃，他们与农业进口垄断集团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而是同一“权力组合”中的政治伙伴。这一十分不稳定又非常复杂的政治关系的存在取决于他们都不要求取得经济上的控制权，即国家垄断不对私人垄断构成威胁。战争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替代进口进程的迅速发展促成了双方利益的平衡，即不仅扩大了民众消费，提高了工资水平，而且在不损害垄断利润的情况下实现了工业企业的资本化。

从在政治上开始提出替代工业化时起，就存在对这种发展模式的限制。首先，必需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快速替代进程可能减缓；其次，在民众不断参与国家收益的分配和加快资本形成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后者将大大影响其他社会集团尤其是农业出口垄断阶层的收入水平。

在此应该指出，在简单替代进口进程的相对减缓和民众主义不再作为“自由”经济框架内的权力基础这两者之间有着相互联系。有关“国家主义或大企业”的争论开始超越简单的理论范畴而成为实际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问题，前阶段的基本政治格局很快崩溃，并被寡头——民众迅速崛起的现象所取代，但后者的实质却是“发展主义联盟”。这是一种新的对立形式，其中，某些阶级价值成为民众



动力的催化剂，并在企业集团试图进行国家重组的有效行动中突出表现出来。这种行动不仅体现了与民众利益相关的政治利益，而且更直接地反映出该集团自身的经济利益，并时常超越国内市场的范畴而走向国际垄断联盟之路。

第二节 民众主义和国家的发展

巴西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企业阶层在对外扩张时期并未获得足够的霸主力量和现代特征以剥夺传统农业部门的权力，民众、农村和城市阶层也未在同一时期统一起来形成“工薪民众”。正如我们在研究“转型”期（替代工业化始于这一时期）时所看到的那样，权力体系不仅包括“传统寡头”部门（出口部门及大庄园主集团等非出口部门的统称），还包括能参与国家统治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工商资产阶级。由此，巴西的统治群体与那些进行“自由式”工业化国家的统治群体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在巴西，国家不仅是规范工业体系的工具，而且通过建立公共的、主权的或准国有的企业而成为工业体系的直接创建者。而民众的状况则与前面描述的阿根廷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巴西，工人的重要性不如广大的城市非劳工民众（无业游民）那么

大。还有一个突出的区别是，存在一个广大的农民阶层，他们的生存环境与城市民众有着天壤之别。

在巴西，民众主义就像一根链条，把在工业化中形成的城市民众以及因农业转型或农业经济衰退而淘汰出来的农民阶层与新的权力体系联系在一起。同时，民众主义自身也转变为一种民众政治，它以软弱的工会组织为基础且不涉及农民阶层和城市民众，这种民众主义旨在维系相对有限的政治参与。

由于不存在一个农业进口部门，因而无法建立起一个重要的工业辅助经济，而且在出口经济危机之后，旧的权力体系无力继续控制国家，工业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这一替代性工业化是在国家的直接干预和独立于农业进口部门之外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实现的。更加突出的是，不仅基础工业的传统部门在公共权力部门的推动下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且汽车工业和中间产品工业等耐用消费品工业在其发展初期也得到了国家的直接扶持。此外，在上述情况下，工业化政策在这一阶段服从于“民族主义的经济”指导方针^①。

^① 请参阅卡洛斯·莱萨所著“经济政策的经验：巴西—智利（一次比较尝试）”一文，1967年《经济季刊》第36册，第135期，第445—487页。



政治联盟的基础十分复杂，其中包括带有“传统”色彩的大庄园主集团、城市民众阶层、中产阶级以及工业、金融、贸易企业集团等。那么，在如此复杂的“权力条件”中，是哪些结构因素使得“民族主义的经济”指导方针成为可能呢？

究其原因，仅将其归因于不存在一个能起到工业进程融资工具作用，并带有国内和国际性质的私人集团是远远不够的。与阿根廷相比，巴西的差别不在于私人集团是否存在，而在于其经济引力较小，尤其是它无力推行一项自由的工业化政策。因此，只有当农业出口集团丧失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而那些掌控国家机器的集团无法通过自由式发展分享利益时，工业化才能取得进展。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自1930年起，在确定工业化的进程中政治因素比经济因素更具影响力。统治者既未从企业集团角度出发，考虑形成一个能够刺激发展的国内市场以实现自主经济扩张，更未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只是在第二阶段，当工业推动力出现时，他们才在政治上重新考虑到企业集团的利益^①。

政府建立工业部门的举措，从政治上讲是由于

^① 请参阅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所著《工业企业家与巴西经济发展》一文。

就业体系未能有效吸收民众，民众的不满引起了社会动荡，并对掌权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对那些被国家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阶层构成了切实或潜在的威胁。在那些已经进行了城市化的、其原有农业经济已经衰落而资产阶级无法立刻满足就业需求的国家，国家发展的要求（即以全民利益的名义提出的要求）以及国家为开创繁荣局面所采取的行动是强制性的。推进新政策的权力架构是以联盟为基础的，这一联盟原则上包括较落后的大庄园主集团、为国内市场提供产品的农业生产者、城市中产阶级、已有的工业部门和城市民众，而不包括农民及参加了30年代革命的、在旧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出口集团（咖啡种植者）。30年代革命之后，如果说农业出口部门仅仅是暂时失去了权力的话，那么农民则永远被排除在“发展主义联盟”之外了。

在巴西，支持国内发展政策的同样是那些利益相互矛盾的集团。为制订一项建立现代经济部门的政策，并为民众的参与创造条件，其他集团有必要与巴西生产结构中较为落后的部门（非出口体系的大庄园主）结成政治联盟。另一方面，这一政策是否可行，也取决于对民众阶层的划分，即取决于对受益于发展的城市民众和未参与发展进程的农民的划分。其原因是，由于增长速度相对受到限制，经

济的积累和扩张无法承受农民在有利的条件下进入劳动市场而带来的工资压力；同时，农民的加入将打破包括大庄园主在内的“发展主义联盟”，而大庄园主政治势力是靠将农民排斥在分享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之外来维系的。

正是那些程度不同地遭到排斥的各阶层为工业化付出了代价。因为工业化初期要靠国家力量对出口部门进行限制，并继续将无业游民、农民和城市民众排斥在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口集团开始转向参与发展进程，即开始将其资本转向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领域。尽管如此，农民仍然与发展带来的收益无缘，并在参与政治时继续受到限制。那些将“发展主义联盟”扩大到农民的尝试不仅未巩固联盟反而使它受到损害，而当民众主义试图达到此目的（如古拉特的尝试）时，它便不再是合法权力的基础了。

在社会结构特点及发展政策以联盟为基础的条件下，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作用十分有限。民众主义似乎像一场将城市民众融入国家的空洞的运动，它来促成大规模工会组织的建立，也来强烈要求提高工资，这与庇隆主义如出一辙。这种民众主义不是一种在经济上确定劳动者（他们试图实现政治参与）权力的形式，而更像是一种为“穷人”进行的政治运动，旨在通过这一运动获得经济上的好

处，并将民众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而工人阶级的社会脆弱性削弱了自身在城市民众中的地位。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必要的资本积累与再分配的压力这一对矛盾在替代工业化阶段表现得并不突出。如果从企业式的角度来看待民众主义的话，其结果是国家不但是一个老板，而且在民众看来还是一个好老板。民众在经济上的要求相对较弱因而容易得到满足，而在要求巩固国家的压力下，民众在政治上的要求与权力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些集团没有属于自己的牢固的经济基础，因而他们支持国家发展进程。

如果联盟的确有利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它必然会排斥日益扩大对国内投资的私营部门的参与，因为国家希望通过其自身的活动来巩固国内市场。为达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发挥分配贷款和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作用。随着工业经济基础的扩大以及工业部门通过银行体系与出口部门及外国资本相联系，抨击国家作为企业家的“无能”以及反对将民众主义奉为发展政策的压力日益增强。这些持续增长的压力在明确确定了“国家主义”或“大公司”政策，并以此控制了重工业、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生产部门以前，只能得到城市中产阶级、害怕与有效的私人垄断竞争的企业界以及围绕国家形成的民众阶层的支持。从此，民众主义体系的脆弱性



在与私人集团的霸主意愿对抗时显露无遗。当简单进口替代进程结束，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更多的积累和更高的效率时，上述脆弱性进一步加深了。由此，当其他的社会力量和指导政策超越了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时，工业化就进入了下一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西，当私人、国有和外资企业基本占主导地位并巩固了“发展主义”之后，民众主义又短暂地回到国家政治中。这发生在古拉特政府为维持政权而实行民众政策的时期，该政策试图通过组织和吸纳农民以及增加城市民众的参与和经济利益来扩大支持政府的力量。很明显，这种努力只能表明，要协调明显矛盾的各种利益是不可能的。不仅民族发展主义联盟的最高层产生了分裂（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大庄园主仍然是当时的统治体系中的一员，同时在农民融入群众运动后联盟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而且民众主义承诺扩大公共领域的积累，这一沉重的社会代价使得古拉特政府在不影响资本主义体制扩张的前提下继续进行经济利益再分配变得越来越行不通。这样，民众主义在该阶段已难以发挥动员群众的作用，也不再有利于发展进程。

第三节 发展主义国家

在飞地经济国家，其发展是在国外市场的扩张阶段实现的。正如我们所见，一方面这类转型因中产阶级集团更加广泛的参与政治而必须进行国家重建，另一方面，民众阶层成为重建的必要力量。这样，无论是新兴工业部门还是民众阶层，都在国家内部相互争斗，或至少是相互竞争。在上述条件下，国家促进了工业化发展。这不仅因为控制国家的部门需要建立一个快速积累资本的机构，而且由于这些部门是由民众和中产阶级集团的联盟所构成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产阶级集团中既有官僚阶层也有处于萌芽状态的新资产阶级。为维护这个联盟，需要为民众的参与提供或扩大空间。这种“模式”在墨西哥和智利有所表现。在智利，旧的城市经济部门仍然重要，因为它足以控制发展或利用一切有利因素重新焕发活力；同时，历史更久、组织更好的民众阶层则要求参与制订指导发展的政策。总之，无论是冲突还是联盟，智利的政治总是带有“阶级政治”的特点。

总而言之，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必要建立一种能规范联盟和巩固工业化政策的机制。



1. 墨西哥的工业化进程

一场巩固了新的政治权力的革命在经济领域表现出其极其脆弱的一面。经济基础部门，如交通、矿业、石油和能源等仍然掌握在强大的外国企业手中，因而束缚了墨西哥政府的执政能力。政府难以找到有助于其稳定的坚实的政治基础。旧的农业权力体系被摧毁，结果是分解了农民阶层，即便他们是革命的热情拥护者，也难以建立起一个牢固的经济基础，以保障革命进程的继续发展。此外，工人也缺乏坚定性。例如，由于工会组织各自为政，使得外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缝隙来提出他们的条件，这证实了上述判断。这个体系的弱点在于，它在结构上缺乏农民和工人的政治支持，面对外国控制下的经济的吸引力又表现出其软弱的一面。

在与外国企业打交道时，为争取有利于己的地位，政府惟一可利用的资源是，组织并联合工人和农民运动。这正是卡德纳斯的政策。只要将这些阶层团结起来，就能够对抗外国企业。众所周知，冲突发生在石油部门，并导致了这一部门的国有化。

国家在民众的支持下开始了墨西哥的工业化进程，但其社会主义指导方针不仅使外国投资者也使本国经济部门保持警惕。虽然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工业化的必要性，但如何以及由谁来进行工业化却是

争论的焦点。在革命进程中建立起来的相对团结的统一阵线因此面临威胁。墨西哥最终选择了这样一种工业发展方式，即在国家可控制的范围内有选择地接受外资（这项政策始于阿维拉·卡马乔，阿莱曼延续了该政策）。人们试图通过工业化及上述政策带来的经济增长来迅速满足民众的要求。这样，大部分工业部门吸引了美国的投资，而美国则从墨西哥政府提供的保障和便利中受益。外资不仅流入工业部门，而且也流向金融和商业部门。国家的任务是维持这一良好的新兴市场，而无意中又为外资垄断创造了条件。

国家继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确保良好的市场条件，只为换取工业投资者参与本国的生产活动。装配工业由此获得了发展，但不仅是工业活动部分受到外国投资者的控制，农业领域也开始了相似的进程。如果说农村改革特别是“集体农庄”从政治上支持了革命的话，那么在经济政策中体现农业的重要性就是必要的。国家开始投资农业，这使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但是迫于建立一个高效农业基础的压力，国家开始倾向于农业中更加资本化的部门，典型的例子是棉花经济，它凭借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成为先进的农业生产部门。商业化是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手段，而大部分商业却被较先进的集团控制着。在工业中也同样如此，商业化促使



外资尽快进行自我完善。那些在政治上控制国家的各阶层与新的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密切，这样，前者的命运开始取决于现代私人 and 公共经济集团有多大活力。同时应该强调的是，城市民众并未置身事外，而在思索这一进程会给民族经济带来什么变化。

2. 智利的工业化进程

1929年的硝石危机最终改变了各社会力量间的权力关系平衡，并且导致各集团和阶级之间建立起新型关系。

由于旧的经济基础被破坏，以及外国公司开始拆除硝石开采设施（我们不会忘记，在国际市场上天然硝石正为人造硝石所代替），因此只有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才能采取一项保障就业的政策。这样，建立一个新的能维持平衡的经济体系开始被提上日程。多亏了这次危机，才使得当时的历届政府均采取了一些发展工业的举措。虽然那些为此而采取的经济措施很不完善，但产生了重要的结果。或许控制外汇的政策是最具深远影响的政策，它在某种意义上使旧的进口部门不得不将其可支配资金转向国内投资，并由此建立起本国工业部门，以替代他们以前从国外的进口。

危机的影响如此之大，因此不能指望企业界的

有限应对措施能填补因外资撤离而形成的经济空洞化。因此，出台了应对严重局势的临时性措施，国家开始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并采取了其他措施以拉动经济。1929年的硝石危机产生的两个重要的后果，一是导致替代工业的建立，二是凸显出国家以某种方式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必要性。

利益关系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对立多于政治联盟，这或许是权力自身的脆弱性所导致的，因为这种权力最初只是寻求经济上的新的支撑点。

民众被组织起来，并拥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同时他们在达成每一项新协议的过程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中产阶级，特别是以某种方式依附于国家的中产阶级也被组织起来，并希望结成一个能保障他们参与政权的联盟。“人民阵线”的建立（1937年）表明这种联盟是可能的。除中产阶级和民众阶层外，一些较强大的经济和社会集团则希望在新秩序中提高他们的地位。由于拥有了公共权力，“人民阵线”通过“生产发展委员会”（CORFO，成立于1939年）开始执行规划民族经济的任务，国家通过该委员会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外部因素对这项新政策是有利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使这一政策变得不可或缺。同时，二战也使得替代进口成为应对时局的必要手段。尽管国家的意图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规划，但这一政



策主要还是旨在指导新的生产活动（如工业发展、能源、基础工业等），而不是改革原有的部门。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实施了一项面向出口的种植多样化政策，而这一政策并未给所有制结构和社会格局带来变化。

在工业领域，该政策提出通过贷款和借款方式来建立一个“工业资产阶级”。由于国家政策提供的保障和便利，包括外国工业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都得以建立并开始运作。

这使得一些原有的资产阶级部门重新焕发了活力，它们将自己的资金投向工业领域并且加强了商业部门。面对持续的民众压力，掌提着大部分国家机器的中产阶级与恢复活力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抵御民众和工人的压力。在该联盟的支持下，经济发展计划的基础是国家向新的集团提供贷款和便利条件，以利其进行市场运作。

另一方面，外部势力也得以恢复，即铜的开采代替了硝石开采，国家可从该部门获取政益。然而，外部势力的恢复却意味着工业发展的停滞，工业部门的增长率明显下降，甚至可以称之为全面萧条。

在没有严重的政治冲突的情况下，盟友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统治阶级脱离民众这一盟友直接意味着其统治面临压力，尤其是当1948年的“维护民

主”法所建立的完好组织形式发生破裂的时候更是如此。中产阶级立场的变化也使他们在新的盟友面前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重新建立这个联盟需要作出新的努力，但现在缺乏过去那样的政治组织，它曾在各社会集团的妥协中发挥过代表作用。一种完全没有固定组织的“民众主义”成为联盟的形式。该“民众主义”（存在于伊瓦涅斯第二届政府初期）的寿命很短，实际上只存在于伊政府执政的第一年（1952年至1953年），阻碍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它无法为急剧增长的通货膨胀找到经济上的解决办法。为恢复经济稳定，智政府采纳了克莱恩·萨克顾问团建议的最为传统的经济措施（需要指出的是，外国贷款正是以采取这些措施为条件的），这一举措导致统治开始失去民众的支持。

“民众主义”带来的混乱状况，在重建代表各集团斗争的政治组织时是无法预见的。因此，当“民众主义”消失后，新政府作出了明确的政治和社会决策。工业、金融和农业部门不再通过国家来维持对国内市场的控制权，而是将从前由国家进行的经济活动交给了私人资本。在亚历山德里的社会政治观看来，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从政治上分割了社会各阶层的权力。



第六章 市场国际化：依附的新特点

如果说在形成国内市场时期的某些情况下，工业化政策是在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间稳定关系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那么，致力于建立资本货部门和巩固企业家集团的资本主义经济多样化时期则带有民众主义危机和代表统治集团的政治组织的印记。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反映出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与国外经济霸权之间的关系。

关键是要明确解释以下两种动向的性质和关系：一是国内旧统治体系的危机和为政治重组所做出的努力；二是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的绝对统治中心之间关系方式的转变。认为那些限制发展、政治和对外依附的新因素仅仅局限于经济进程范畴的想法是荒谬的，那样就会相信，自依附经济中形成一

个先进的资本主义部门以来，政治进程中的经济决策直接构成决定政治生活的经济限制条件。事实上，依附的概念继续构成这一发展体系的基本特征，而政治仍然是能够决定经济的工具。另一方面，就像我们稍后将看到的那样，作为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心和外围间的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的加强直接导致了国内危机的爆发。

我们所提到的转变是指国内利益斗争的转变和中心与外围关系的重新确定等方面。在这一新的发展模式中，生产体系自身的结构和反映社会集团与社会阶层间力量关系的国家特征和社会特征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旨在促进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在拉美国家的发展，而当时的拉美仍是作为国际市场的外围而融入其中的。

第一节 民族工业化进程的结构制约

在前面章节中已经谈到，在哪些条件下某些拉美国家的“发展主义联盟”才能制定有利于扩大其国内经济基础的经济政策。实际上，至少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在不同时期都曾经成功建立了有利于巩固国内市场的权力体系。除了已经谈到的不同特点之外，在这些国家形成了某些联盟或权力组



合，这有利于广泛调整原有统治体系和因中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包括城市民众的出现而形成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显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这些联盟或组合为联盟成员所带来的好处是不同的。但无论如何，在国家能够制订仲裁政策（即，有组织的集团和民众阶层的压力被很好地引向达成有利于发展的妥协这一目标）的条件下，各国都能形成有利于国内投资的积累并实现相当规模的城市消费。当然，正如我们所说，体系的运作取决于有利的环境。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出口价格得以保持有时甚至有所提高，这保证了出口部门继续得到回报，至少是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其利润水平，同时，也为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资金。

由于原有的特定政治协议的作用不同（它导致各国工业化政策的进程不一样），因此上述有利环境的消失给每个国家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这样，在阿根廷，尽管存在着强劲的经济利益再分配势头，那些已提到过的政治特点仍然使得出口农业生产部门的经济重要性得以保留，同时，阿

根廷的经济活力部门（主要指基础工业部门）^①尚不具备突出的重要性。国际市场新的形势明显带来了一种急剧变化，即为提高工人收入水平和改善农业出口经济的生产率（目的是为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长期提供资金），有必要在要求增加工资和加大公共投入方面进行斗争。1955年底隆下台后，“反民众主义”派就提出了这个目标。在此情况下，不仅出口部门不能凭一己之力将它的发展计划向全国推广，而且政治基础（尽管它通过与政治上软弱的国内工业部门结成联盟而得以扩大）也无法应对与之对立的民众压力。于是，军事干预开始变得司空见惯，它以仲裁者的面目出现，并公开反对恢复民众主义。也就是说，要想以发展主义联盟的方式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既面临着广大工薪阶层的强烈反对，也无法轻易推行一项即便不是合法的但至少是有效的政策。结果是，既没有获得发展，也没能保持政治稳定。

在巴西，瓦加斯体系及其经济政策在杜德拉政府时期（1946年至1950年）得到延续，这便得一些基础工业，如钢铁、电力、交通和石油工业等得

^① 请参阅阿尔蒂米尔、圣玛丽亚和索罗列合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经济发展》，第21～25册，1966～1967年部分：“战后时期促进工业的工具”。



以建立。在瓦加斯第二任期内（1950年至1954年），类似的经济活动更加明显，如对战略部门的公共投资刺激了发展，也大大加快了城市生产结构的改革。如果说战争的有利形势确实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那么无论如何它推动重新组建了工业园区，尤其是维持了一项大量进口设备的政策（主要源于对朝鲜危机可能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争的恐惧）。此外，由于朝鲜战争的“打响”，国内力量更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但是，这种工业化所付出的政治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对外汇及多种汇率的控制有利于国内的私人和公共部门，但损害了出口部门的利益。因此，出口部门从未放弃反对国家干预制订各种汇率。的确，直到1953年，咖啡的国际市场价格一直较好，咖啡种植者能在不损害其利润水平的情况下，支持保护和快速扩张国内市场的政策。到了1954年，当形势发生变化时，瓦加斯联盟走到了尽头。一部分农民倒向由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反对派，从而站在了国内和国际金融集团的一边。美国利用这种对咖啡经济不利的新形势向在民族主义道路上走得太远的瓦加斯施加压力。在瓦加斯自杀而出现的短暂的权力真空期之后，当一项旨在治理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的政策初现端倪时，在库比切克的领导下重建起民众——发展主义联盟，这一联盟有它自己的目标，与经过数年的观

望后弗朗迪西试图在阿根廷的政治和经济进程中所推行的相类似，即通过外部资源来实现资本主义化。这项政策在短期内能够减轻通货膨胀压力，满足现代城市集团的工资要求，也就是说，该政策是部分出口部门支持的一项经济政策，并加强了现在已经与外国资本联合的工业部门的力量。因此，尽管政治动荡，但仍能取得发展。

在墨西哥^①，由于历史政治特点，社会集团在国家或政党内部施加压力。与巴西和阿根廷的情况不同，墨西哥的国内生产体系可以在无政治——军事危机的条件下向外国资本开放。国家发挥了投资者职能和规范国民经济的作用，城市工业金融资产阶级也通过国家得以建立。同时，工会一体化机制实现了“现代化”并建立起一些渠道，工人运动通过这些渠道可以参与到社会中去。在这一社会中，国家政治具有合法性，其分配制度也是适宜的。

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一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与企业家利益之间的对立（这在巴西和阿根廷不明显，国家的民众主义性质使两国既具有民众主义特点又具有企业式特点），或者至少避免了这种对立的激化，并且阻止了一种阶级主义或民众主义冲突

^① 请参阅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所著《墨西哥民主》，时代出版社，1965年出版。



的出现，就连允许外国资本参与本国经济（开始是有限的但随后不断增加）的政策也没有导致严重的社会对立。在这些条件下，发展和稳定得以同时实现^①。

然而，需要对上述论述作一些说明。应该指出，发展必须遵循其必然方式和宗旨来进行。不能将资本主义发展必须通过外部参与和控制来实现这一假设强加给历史；也不能任意作出与前述观点相悖的结论，即历史的惟一偶然性造成了拉美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和依附性。相反，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各社会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构性弱点制约了国家控制下的工业发展。

这些力量间的冲突或妥协没有一定之规，在特殊情况下，他们互相影响而产生的结果与我们分析的历史轨迹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古巴的情况。各国的社会关系体系通过权力体系历史性地建立起一个各自特有的、包含多种结构可能性的整体。在这些结构可能性中，通过社会实践确定了每个国家特定的轨迹，并排除了其他一切选择。

确实，从结构上看，在拉美社会独特的政治和社会框架中进行的工业化需要大量的积累，但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社会的两极分化。要求参与经济和政治

^① 见《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经济研究》，1966年。

治的各阶层（无论是已经实现了参与的还是仍处于局外的），均反对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投资及其必要性。

我们已明确了“拉美的内向型发展模式”是建立在有利于商品交换和少数人在发展中受益的基础之上的。优势地位总是短暂的，这减小了专制政治的重要性，并保障了民众的参与和“发展主义联盟”的形成。这一“发展主义联盟”可称之为民族的民众主义（瓦加斯主义或庇隆主义）或国家发展主义（如在墨西哥），它不排除外向型扩张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和部门的参与。在这些条件下，为满足农民或城市民众要求更大规模地参与的压力，发展主义联盟所具备的资本积累能力被削弱，霸权政治联盟这一重要环节也出现了裂痕，农业部门特别是庄园主反对民众主义国家，或反对可能支持民众意愿的城市工业部门。当城市民众阶层增加工资的要求十分强烈时，农村地产主集团可以在工业和金融部门（他们也无法满足民众的这些要求）找到其盟友，并结成与民众对立的联盟。如果国家或城市工业部门在不利的国际市场的条件下，强制推行一项将农业部门的收益转移到城市部门的政策时，同样会受到农业部门的反对。

此外，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即便国家拥有自主生产体系，并能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经

济发展，但由于工业积累和融资都是通过出口来实现的，因此出口对发展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无论从哪种国际市场条件来看，出口规模显然都不是由国内来控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加重了出口体系自身的局限性，这为成功推行可能的经济发展模式增添了新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排除历史偶然性或经验主义不谈，作为权力支点的充满活力的民族民众主义或国家发展主义政策认为，必要的国家干预有利于保持工资水平，也有利于战略部门和特定条件的巩固，这在政府需要民众的支持或需要扩大消费时表现得比较突出。城市工业的发展（至少在替代进口阶段）要求更大规模的民众参与。如果不是指相对人数，起码也要求有一定的绝对数量。这一切增加了民众的影响力。然而，当民众压力与出口产品价格危机或通货膨胀导致的利润转移加剧同时出现时，政体就会面临威胁。

在政治体系发生危机而无法推行一项公共和私人投资政策以保持经济发展时，国家将不得不放弃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即对外国资本的开放。但所有这些措施，正如事实上所发生的那样，都是暂时的，除非当时的条件允许进行一次极端的政治变革并向社会主义转变。但在已有的政治结构框架内对其中的几个条件进行研究后证明，这种变革是缺乏可行性的。

假如，民族工业部门能取得霸主地位，即能控制国家的话，就可以在以下条件和政策指导下成功推行工业化政策：

（一）稳定出口价格以继续保持收益的转移进程（但由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制定超出了国民经济所能控制的范围，因而这一政策是明显行不通的。同时，价格因素也成为阻碍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二）与农业出口部门斗争以保持收益的转移进程（但这不仅会彻底改变两者的妥协框架，而且会影响和缩小融资基础）；

（三）控制工资政策（它不仅会破坏政治协商体制，还会导致与组织起来的劳工阶层的对立，并对国内消费市场构成威胁）；

（四）加大将城市民众阶层排除在经济进程之外的力度（这一政策拒绝接受民众的压力，因而权力支撑结构将面临发生政治危机的风险）；

（五）关闭国内市场，以延缓外债压力（这就意味着与国外霸权部门的对立）；

（六）继续排斥农业部门，加大地区差异（这种政策尽管不会导致政治体制的深刻危机，但会产生磨擦）。

相反，即便是危机仅发生在民众主义政权内部（即发生在这样一种权力体系内，其中不仅有城市



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民众领袖，而民众是维护政权的重要力量)，也无法在不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或（作为替代选择）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实现发展。的确，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对立关系外，作为转移矛盾的方式，还出现了有关工资待遇的斗争和阻止民众不断参与经济决策的斗争。这些新的斗争直接触及到民众国家的核心，这是因为，民众阶层继续支持联盟是以加强有利于收入再分配的压力为前提条件的，而企业、私人和公共部门也无力在满足收入再分配的压力同时进行资本化和投资。

民众主义的根本出路是，让另一种建立在工业资产阶级和农业出口部门联盟基础之上的体系来取代它。但是在这一替代体系中也存在着冲突的可能。由于外国投资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可能，而不是民族出口部门的资本来源，因此农业出口部门在支持市场向外国经济集团开放方面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盟友。此外，由于城市劳工阶层是唯一为积累付出代价的阶级，因此他们将破坏这一权力体系或对其进行政治扼杀。

显然，以上提及的一些可能性在实践中即使不是以完整或纯粹的形式出现，也至少是部分地或以交叉的形式出现过。

第二节 国内市场对国外控制的开放

就政治和社会可行性而言，上述论断表明，如果不推行政治结构的深刻变革，就不能在国家范围内保持工业化的速度。然而，我们没有明确指出，同样存在着国外工业资本寻求新的市场的行动，也没有说明这些资本可能以至少为权力集团所接受的方式来协调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各方利益。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方面。首先，在50年代，国际资本活动的特点是资本在短期内从中心向外围转移；其次，工业合作以投资的方式进行，这不同于过去明确地使用财政手段或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的方式，由此，出现了“要求新投资的压力”。这一情况虽然起先来对推进工业化起决定性作用，但此后其重要性日益显现。众所周知，事实上，替代工业化和巩固国内市场的初级阶段是在国内的公共和私人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前面的章节中讨论过的那些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济



政策^①对资本积累起到了政治催化剂的作用。而且，正是这些政策促使外国工业产品供应商对外围经济进行投资。这种投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投资在已有市场内与国内工业部门竞争，并常常凌驾于国内部门利益之上，两者在汽车及配件工业中的关系就明显表现出这种状况；另一种是通过投资暗中控制扩张中的市场。

当发展进程处于替代进口不断增长的阶段时，如果仅仅看到外资进入使一些工业部门被边缘化的一面的话，那么就应该指出，它作为促进发展的主要因素的一面却被忽视了。实际上，国内工业部门仍有断的投资领域^②。因为每一种产品的替代生产都会刺激该产品的部件的替代生产进程，由此替代进程产生了一种滚雪球效应，直到只需进口高技术产品和国内没有的初级产品时^③，这种效应才会终止。另一方面，外资对这一进程的推动力加快了劳工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

① 请参阅圣地亚哥·马卡里奥为“第二届区域贸易政策学习班”撰写的讲义《拉美的保护主义和工业化》，圣地亚哥，智利，1967年。

② 这解释了国内企业界的举动，请参阅卢西安诺·马丁斯所著“巴西企业界的形成”，《社会科学院院刊》第三册，第二期。

③ 请参阅玛丽亚·达·康塞桑·塔瓦雷斯所著“进口替代与拉美的经济发展”，《信息—里约热内卢》第一期，第115—140页。

他们为维护“发展主义联盟”作出了贡献。

在某一时期，政治和经济利益可能存在暂时的一致性，这为协调保护主义、民众的压力和外资的利益提供了条件。而表面看来，外资是保障经济发展在弗期迪西时期、库比契克时期和所谓的“墨西哥道路”时期的政治框架下得以继续的条件。

这样，工业部门得到了加强，并确定了工业化的独特内涵，即工业化是建立在规模有限、但能产生足够利润以进行“工业现代化”的城市市场基础之上的。很明显，尽管这类工业化将加强“排他的社会体系”这一外围经济的资本主义特点，但同时并不因此而停止反对这样一种发展，即从生产体系的积累和变革向更高水平^①发展。这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在依附情况下的局限性。

这一过程沿着“正常”的轨迹前进，即斗争中的各种社会阶级力量可以共存，直到所谓的“简单进口替代的高潮”到来为止。从那一时刻起，当明显感觉到替代进程的速度下降时，更为复杂的问题不断显现。这些问题是随着技术阶层和经济上更具

^① 请参阅卡多佐和雷伊娜就这种工业化对就业体系及民众被不断边缘化所产生的影响所著《拉美发展中的社会学问题》中的“拉美的工业化、就业体系及社会阶层”一文，圣地亚哥，大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另请参阅卡多佐所译《拉美的社会变革》一书，圣保罗，书籍的欧洲传播出版社，1969年出版。




重要性的中间产品、资本货工业的形成而产生的，而且是沾沾自喜的发展主义者所忽视的问题。在此情况下，生产体系无法实现自我改良，这使民族企业与外国垄断集团的协作关系加强了。同时，还应该看到，来自处于这一新的框架之外的社会阶层的压力不断加强；被边缘化的替代阶段初期的工业部门表示抗议；城市民众阶层反对大型私人生产企业关于“提高生产力，减少劳动力”的方针，要求回到国家发展主义政策上来。这样，旧的发展主义联盟宣告彻底破产。

事实上，从那时起，工业体系中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结构开始出现分化，形成了一个更“现代”的和一个更“传统”的无产阶级；一个控制着高生产率和高技术工业的企业部门和一个产生于简单进口替代阶段的“传统”工业部门，依此类推。上述各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在新的发展条件下重新确定了其位置，并在这一新时期的政策主张和意识形态中反映出各自的立场，而社会政治动力正是从各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对立和调整中获得的。

第三节 依附与发展

在讨论新阶段的社会力量和指导思想之前，有



必要阐明“新的发展形势”的历史结构条件。其根本特征是，外围工业经济融入世界市场的意义与部分农业出口经济融入国际市场的意义是不同的，同样，依附条件下的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政治含意也是不同的。对第一个问题的解释是“外围工业经济”这一概念所表现出的哲学上的二律背反。

外围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这一新模式，是因为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不像从前那样仅限于进出口体系之间的联系，现在还表现为中心国家对新兴国内市场的直接工业投资。这在分析拉美的国外融资时得到了证明。研究表明工业部门的外资流入不断增加，并且这一流动是通过私人投资（其中，“直接”投资大大多于“协议”投资）的方式和以少数企业为中介来实现的^①。

因此，如果不能说拉美工业化是中心国家扩张的结果的话（正如我们所见，该进程始于世界经济体制危机时期，并在国内社会力量的推动下进行），那么，却不能不承认，在作为世界经济外围的拉美工业化中，外国企业的直接参与对地区工业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民族主义——民众主义时期，

^① 请参阅拉美经委会的《拉美的国外融资》一文，特别是其中的第 225 ~ 238 页，纽约，联合国，1964 年。“应该强调，1950 年，拉美 300 多家企业资产中的 91% 都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引自该书第 238 页）



工业发展巩固了民族生产集团，尤其是巩固了国家在规范和形成生产体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也产生了负面效应，比如，已描述过的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使得发展建立在外国增加对工业部门的投资的基础之上。

当谈到带有这些特点的“发展形势”时，必然再次提及国内增长与对外联系间的特殊关系。即使不深究因国外融资而产生的依附的种类，仅从负债（主要是短期债务）不断增长这一情况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垄断工业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依附与在欠发展条件下的依附具有不同的意义。

从生产体系的分化程度来看，这一条件可能产生较高的发展指数。尽管如此，无论是资本的流动还是经济决策权都“源于”外部；无论是生产还是贸易的利润都产生于依附的范畴内，这无形中增加了中心国家的可支配资金的数量；投资决策也部分取决于外部决策和压力。显然，国内市场所产生的利润的去向与外部条件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宗主国的决策只部分考虑到国内市场形势，但对民族生产体系产生的利润的再投资则有着显著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会把利润变成资本，并对中心国家或利润来源国以外的其他外围经济进行再投资。

总之，需要强调的是，在新的依附形式与通过飞地形式建立的依附经济（前面已经阐述过）之间

不只存在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严格来说，外围工业化经济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不同的。这类经济的运转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经济多样化程度高；

（二）剩余资金流出相对减少（以保证再投资，尤其在资本货领域的再投资）；

（三）劳动力的专业化和第三产业部门的出现，使得在工业城市部门的收入分配相对更平衡；

（四）结果是国内市场具备了消化工业产品的能力。

也许可以说这种经济与飞地经济发生的情况不同，因为尽管投资决策仍部分取决于外部，但消费是在国内。更典型的例子甚至表明，出现了向当地再投资的强劲势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外的工业投资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经济扩张。


从这一形势看，可以设想发展与自主是共存的。尽管继续存在的依附是另一性质的（或者说有新的特点），但这类发展仍旧是扭曲的和有局限性的，因而，将此类发展类型的国家称之为外围国家和依附型工业化国家是合理的。的确，欠发展状态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在此已不再是直接的和政治性的（如同在飞地经济情况下所发生的那样），也不仅仅体现了世界市场的决策对国内的影响（如同在本书所描述的第一类欠发展经济中所发生的那样）。相



反，民族经济与中心经济的动力核心之间的关系是在国内市场中建立的。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以下两方面体现出扭曲的特点：工业部门的发展继续取决于资本货和本国欠缺的原材料的“进口能力”，以实现生产体系新的分化（这与金融依附有着密切关系）；同时，这一发展模式要求国内市场国际化。

关于“进口能力”的障碍，可以说资本货国产化形成后，其影响力大大减小。这一障碍只是暂时的，但它在“发达”工业经济扩张的初级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此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可以说是正常的，在现代经济中总是存在着相互依附。

“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所产生的联系与上述截然不同。这一联系是在当外围经济中的现代经济的活力部门组织起工业生产，主要是化工、电子和汽车工业时，以及在利用新的生产技术对旧的工业生产进行改造时产生的。这一新的工业革命导致了行政管理、技术和金融机构的重组，从而导致了社会和政治控制方式的调整。即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也不能说新技术本身，或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外资流入导致、促进或指导了发展进程。事实上，体现各社会力量间斗争的政治架构在某一特定经济、组织和技术进步与社会的整体活力间起到了积极的调和作用。肯定取说，外围国家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初期需要具备大量的资本、丰富的科技知识和高水



平的企业组织等条件，这些条件要求科学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细化以及预先的积累和投资。中心国家所具备的这些先决条件加重了依附关系。但是，也有些欠发展国家成功地改造了其生产体系，同时保持了应有的自主性。

应该强调的是，在某些政治条件下可以同时获得发展和自主。这些政治条件以不同方式导致了主要基于动员社会和经济资源，以及国内技术和企业创造力基础之上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一进程的某个阶段是与经济相对脱钩的（如苏联等），市场的部分关闭给产品和服务消费（这是劳动密集型工业社会的特点）的扩大造成了困难。同时，一般来说，国家加强了对生产体系的控制，扩大了对国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的投入，比如基础设施领域、高科技领域和与国防有关的部门。这一切都要求持续改造社会体系，建立一个相对专制的秩序（即便在日本这一保持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中也是如此）并在教育等不可轻视和优先的领域进行国家意志指导下的革命。

拉美政治社会发展所走的道路与上述不同。在步入相对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时代方面，地区一些国家通过吸引外资以及随之而来的先进技术和现代生产组织形式，不同程度地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在民族经济自主权和发展政策决策权方面不可避免



地受到了制约。

“市场开放”引起的经济竞争，工业质量和生产力标准的统一，所需投资的规模（从石油化工工业的建立可见一斑），以及消费模式的形成，都要求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和控制方式，这关系到经济全局。因此，通过从国外引进的资本、技术和组织方式，建立起了新的规范化的民族经济轴心。

当这一革命未在民族社会的领导下实现时，它确实在更为复杂的范畴内产生了一种新的依附。前面讲过的欠发展的两种主要情况中，民族国家可能在其权力范围内运用一系列政治工具抵制外部市场的压力（如通过货币政策和就业保护政策），并成功保持了部分国家自主权，具体指投资和消费决策权；而在新型发展中，随着统一市场强制推行现代生产体系的某些统一运作标准，部分民族经济的自主权超出了国内可控制的范围。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因为生产体系趋同，超国家化规定了市场模式及其秩序。

由此，与前面的情况相比，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这类依附经济的运作普遍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其经济措施的参数十分尖锐而又自相矛盾。这样，随着资本运转周期在大生产单位（生产、商品化、消费、金融、积累和再投资）范围内结束，经



济体系的“市场法则”试图在社会中推行其“自然法则”，以限制与其对立的地方集团自主权的范围和效力。

另一方面，需要提醒的是，上述模式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在某些国家中（如墨西哥和巴西，它们的经济规范和参与能力建立在其公共部门创造新资本的能力之上），其强大的国家经济部门不能提高拉美工业化国家的国内决策和真正自主的水平，也不意味着旧的组织和生产控制形式，包括依附概念退出了政治、经济舞台，而正是这一切不断增加了政治生活的复杂性。


支撑这一新的发展模式的政治结构（其中存在着公共部门、国际垄断企业和民族经济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之间的斗争），要求在控制这些经济部门的各社会集团间建立一种合适的关系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需要一种允许其中的各集团进行经济活动的政治局面。的确，这种发展要求市场的运作，市场的活力又主要取决于生产者之间（即企业间）的关系不断加强，而这些生产者又构成了对经济扩张具有重要意义的“消费者”群体。因此，为提高这些“生产和消费者”的积累能力必须抑制民众的需求。这就使得本来旨在扩大消费的再分配政策变得毫无用处，在特定条件下还破坏了发展。

在这样的条件下，随着国家这一权力体系的巩

固日益取决于选举游戏，政治不稳定也增加了。另一方面，随着外资流入因国际资本流动减少而萎缩，保持这一选举游戏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由于“现代部门”的活力与中心国家的生产体系的活力一样，也受到几乎是自发形成的扩张机制的制约，这增加了实行官方保护主义的难度，从而排除了保护进口替代阶段形成的原有民族工业的可能性，而推行一项劳动密集型发展政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工业部门要求一种新的发展战略。

这样，从那时起，发展加剧了社会排斥。这不仅是对民众的，也涉及到其他一些社会阶层。它们从前具有重要经济影响力，现在则不仅隶属于现代垄断部门，也从属于政治统治体系。然而，如果说工业部门的现代化及多样化是通过国际垄断生产单位这些“现代化孤岛”插手原有的农业出口国家（其中存在着一个通过农业贸易与国外保持联系的部门和一个大庄园主集团）而得以实现的话，那么在垄断出现之前就已形成的工业部门、中产阶级以及已经分化了的民众阶层（包括城市、农民阶层和劳工阶层）也都一直存在着，并谋求团结起来建立他们所希望的社会、经济秩序模式，以实现其自身参与发展进程。同时，在其他经济部门仍处于欠发展状态的情况下，现代工业部门和已实现工业化的农业部门得以维持自身存在并以相对缓慢的节奏扩



张着，但其存在及发展尚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对整个社会进行“现代化”。相反，由于这些部门采用了先进技术而限制了民众参与，以及市场也仅限于国家采购这一生产大户和购买大户之间狭窄的交换渠道，因此国家继续成为最主要的购买者和不可忽视的生产者。

在经济方面保持民众部分参与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公共经济部门在前一阶段所达到的发展程度，尤其是是否成功地部分控制了现代垄断部门。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控制国有经济部门的人仍然像是“公共企业家”那样，并未采取民众主义式的再分配政策以促进工资水平的持续提高。换言之，国家不再是一个民众主义国家，而转变为一个企业国家。

这一开始发挥效力的政治控制体系的存在取决于它所具备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在各国显然是不同的。比如墨西哥，那里的民众阶层和企业阶层与国家机器中的政治决策体系本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使得根据发展的新形势逐步重组政治控制体系成为可能，而且上述两阶层以及与外国企业相关的部门得以初步确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在另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或巴西，这一过渡过程不仅更为复杂，而且两国政府相对而言也未做好与其他部门分享经济决策权的准备。这使国家不得不调整其职




能，以不断增强规范经济活动的的能力。另一方面，统治集团试图通过政治制度的自我调整来实现中央集权，这有利于在依附经济中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并巩固其统治。

反对这种调整的是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阶层，他们可能是被边缘化的民众、工人阶级和城市雇工（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受到资本主义积累新阶段的影响），也可能是左派政党、进步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阶层等民众主义和发展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组织。反对派中还包括与外国垄断部门没有联系的私人集团，他们希望“面向下层”重组联盟，以获取与现统治集团进行政治谈判的最佳条件。

理论上说，在新的发展和依附条件下建立现代生产部门的国家，其政治决策体系和经济方针的调整似乎是持久的，例如巴西的卡斯特罗·布朗库·罗伯特·坎波斯所采取的管理方式。除了有利于这些政策的内部条件外，国际关系特别是国家安全意识也成为上述经济、政治变革的背景。这种安全意识是建立在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西方联盟将发挥主导作用（由此，国家利益暂时服从于美国领导下的联盟的利益），以及对战争形式的猜测（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性战争，“国外敌人”与“国内敌人”在战争中并存）的基础上的。

尽管如此，这一变革可能产生的结果实际上并



未完全显现。我们所讨论的变革在社会领域推进时与一些具体利益产生了冲突，因此有必要指出社会领域的复杂性和相对独立性。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新的发展模式无疑要求对社会政治体系进行革新，以组成一个不再是或只是部分依赖大庄园主集团、出口部门或轻工业相关部门的统治结构。新的经济部门（其中国际化的垄断企业和与国内市场相关的金融部门占主导地位）寻求对国家决策施加重要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非一帆风顺，新经济部门内部各方之间以及与该进程相关的不同阶级之间为此展开了斗争。此外，公共部门的经济重要性在实现上述发展模式的每一个国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体现了国家操纵建立捍卫政权的新联盟的能力。

上述最后一个论点是决定性的。事实上，从民主——代表政体（在工业扩张初期，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发展主义国家和民众政策中）向行业专制政权的过渡，是在现实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变通方式，它通过革命得以实现。这场革命主要是由军队、公共官僚这些大的国家机构，而不是主要由民族资产阶级或国际化的资产阶级来实行和组织的。显然，给这些集团的行为赋予意义的正是本文所描述的结构条件，即国际化的资产阶级仍旧是统治体系的主轴。然而，拉美的情况是，从所谓转型时期



以来，城市工业资产阶级（它与过去的农业出口资产阶级不同）通过民众压力或占据国家机器中的某些职位，更直接地与国家保持着政治联系，而不是与“阶级政党”保持着政治联系。同样，工薪阶层在国家的监护下，更多表现出工会性质而非政治军事性质。但墨西哥是一个例外。正如所见，该国的政党不仅是国家政治的体现，而且各阶级在国家中几乎是以行业协会的形式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这样，国家的职能比法律机构或有组织的阶级政治更加广泛，国家作为各阶级的政治组织行使着职能。

如果说阿根廷和巴西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危险”、国内暴乱和民众对国家施加压力（存在于古拉特主义中，在复辟庇隆主义的运动中显得更加强大）的政治运动，导致了民众主义的发展主义危机，那么，“军事政变”则推翻了民主政权。而且，这些军事政变的意义及其发展与过去地方军阀夺取政权的情况是不同的。现在，武装力量作为技术官僚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并为他们所认定的国家利益服务。这一转变是有决定意义的，它将传统政治阶层（指那些民众主义的发展主义阶段的国家统治阶级）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并试图通过窃取技术官僚专制权来粉饰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的军事干预，从而达到将军事影

响深植于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中的目的。这样，武装力量和国家机器这两个对整个国家行使政治影响和有效控制的机构部分地合二为一。

这一统治轴心所采取的方式在拉美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政治优势，有组织集团在部分推翻欠发展社会格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使文人社会难以接受与专制制度的合作。

事实上，随着依附国家的这种技术官僚在文人和军人官僚等现代部门的决策和组织能力基础上形成，这一技术官僚阶层受到两方面的压力：其一是来自大工业、金融行业（一般来讲都已国际化）的压力，他们要求进行理性和现代化的发展；其二是某些社会阶层坚决要求在依附国家中推行排他性的资本主义式发展，他们强调发展应有利于实现民族目标和解决国内问题。后一种观点甚至得到了武装力量和国家技术官僚阶层的支持。由此，官僚——军事权力轴心的各个环节不断提出并解决一些问题，诸如削弱依靠地方经济的资本主义力量，重新考虑土地改革、收入再分配以及平衡地区发展的必要性等问题，这些举措似乎比从前的发展政策更合乎实际情况。那些坚持认为经济政策应该有利于经济和收入的公平增长，并认为国家应该成为相对公正地协调各阶级和集团利益的机构的所谓“中产阶




级”思想，再一次有了捍卫者，很多情况下，这一思想得到了文人或军人技术官僚体系内部的有力支持。

但是，阶级和集团间的斗争并未停止，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斗争也不例外。这种民族改良主义趋势要想获得哪怕是暂时的成功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于资产阶级尚未做好政治组织方面的准备，并且其对国家的控制还只是纯“结构”性的，因此，只有当军人技术官僚推行的政策与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张机制发生冲突时，企业集团才有能力开始寻求修正“民族主义偏差”的途径和办法。在这一进程中，那些以国家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为名坚持改革的部门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将其理想变为所有人的现实。

在这一性质不明的变革背后，新权力格局中支持经济改革政策的力量仍然是发展主义性质的，并且是介乎由国家控制经济和由外国控制经济之间的一种温和的发展主义。


反对这种形成中的权力体系的另一支力量来自于统治轴心之外，也就是工人阶级、工薪阶层以及“被边缘化的阶层”，这些阶层都是在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的确，现代工业体系的发展要求加快社会边缘化步伐，并将其视作压倒一切的任务。因此，民众的压力越未越难以通过过去



存在的组织机构（工会、政党、国家部门等）来表达。由此，形成了一个可支配的群体，其新的动员和组织形式依然是个未知数。他们可能成为“起义的策源地”，也可能导致“民众运动”等一系列广泛的政治运动。

通过动员被排挤在发展进程之外的民众来寻求改变现状的尝试，其脆弱性同从前一样，一方面在于这些民众缺乏组织且层次较低、目光短浅；另一方面在于发展和依附的新基础使得工薪阶层发生了分化。正如我们所说，与先进的资本主义部门相联系的工薪阶层从发展中受益，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自下而上的压力，并在要求获取权力的行动中与城市和农村民众的诉求拉开了距离。

显然，在行业专制统治的环境下，即便是那些从属于先进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薪阶层的政治要求，其成果都是有限的，而且更多地依赖于工会组织的完善及中产阶级为建立更直接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相联系的部门而进行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自然包括可以在中产阶级进行政治交易时发挥先锋作用的组织的现代化，比如，大学及其技术研究机构由于具有专业知识，因此在新的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这些转变使得工薪阶层能够重新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并恢复其在制定经济方针方面的影响力。



但是，还不能肯定地说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这些工薪阶级，为政治参与及更多地融入新的统治体系而进行的变革是一种确定的趋势。拉美的政治实践表明，各阶级间的“横向”团结在充满争论的政治氛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铜矿工人或锡矿工人之间的团结，以及国营企业工人间的团结，他们一直是收入最好的和在政治上最活跃的劳工群体。

在当前各集团和阶级对立导致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联合的背后，由大型垄断集团生产体系的运作所造成的普遍意义上的矛盾依然存在。某些特定的大型垄断集团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条件下产生的，而这种资本主义既依附于资金，又依附于主要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所创造的先进技术和组织模式。由此，作为当前历史时期的首要问题之一，发展意味着：要建立起一个超国家的市场，以解决规模经济和社会市场（其中，消费十分有限）等问题；要政造行业专制的政治体制，赢得民众的参与，并营造“民众”社会中的政治稳定；要在相对集中的收益结构中继续扩大积累和提高资本的集中程度。

摆出这些困难是为了使这种发展模式能够动员民众并赢得他们的赞同，从而使得社会秩序逐步得以重建。新的权力体系正与时间赛跑，以在有利于反对派的机会出现之前能够巩固其自身。所有这一切都使人相信，依附国家通向一种相对先进的、资



本主义式的工业生产模式的桥梁就存在于专制政治（不管是军人的或是文人的）体系中，专制体系能存在多久不仅取决于变革过程中所获得的经济成果和社会进步，还取决于我们前面谈到的与专制体系对立的各集团和阶级进行斗争的特点、类型和成果。

结 论

本章节的目的不是要下结论，而仅仅是对所探讨过的问题作一些说明。如果在未对具体条件进行分析的情况下，就将我们提出的可能性和作出的初步诠释当作断言，那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因此，能够继续指导今后工作的见解比结论更加重要。

为此，需要从方法论角度作一些说明。本书试图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问题，从政治性质的角度来诠释经济变革的进程。同时也希望使人们认识到，了解经济变革发生在什么样的“历史状况”下对理解变革的意义、分析其结构局限性及成因都是



及各国生产控制模式的差异，可以确定拉美各国的阶级之间、阶级与国家之间以及阶级与生产体系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类型，即“飞地经济”型和
国家控制出口体系型。

接着，我们要表明这些基本类型的历史演变过程，如特定的社会形式是如何建立的等。我们力求避免两种普遍存在的错误观点，一是相信国家（或民族）政治社会形势由于机制制约而受制于国外统治；二是与之相反，将一切都归因于历史偶然性。事实上，依附国家或“欠发展国家”对国外的依附关系并非不可避免地使得本国历史完全成为国外霸权变革的产物，而国外的变革也并非不深刻影响着本国历史进程各阶段的国家自主权。在研究基于一国生产发展水平和物质基础之上的行为的可能性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可能性与国内政治和法律的关系以及与国外霸权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同时，也正是依附国家的各种集团、阶级、组织和社会运动，决定了是延续、改变还是中断这些结构性联系。因此，只有立足于依附国家自身的动力才能从政治科学的角度理解“事件的过程”。

我们还通过分析在飞地条件和国家控制出口体系条件下产生的国家间基本结构的差异，揭示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如何给各国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及各国生产控制模式的差异，可以确定拉美各国的阶级之间、阶级与国家之间以及阶级与生产体系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类型，即“飞地经济”型和
国家控制出口体系型。


接着，我们要表明这些基本类型的历史演变过程，如特定的社会形式是如何建立的等。我们力求避免两种普遍存在的错误观点，一是相信国家（或民族）政治社会形势由于机制制约而受制于国外统治；二是与之相反，将一切都归因于历史偶然性。事实上，依附国家或“欠发展国家”对国外的依附关系并非不可避免地使得本国历史完全成为国外霸权变革的产物，而国外的变革也并非不深刻影响着本国历史进程各阶段的国家自主权。在研究基于一国生产发展水平和物质基础之上的行为的可能性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可能性与国内政治和法律的关系以及与国外霸权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同时，也正是依附国家的各种集团、阶级、组织和社会运动，决定了是延续、改变还是中断这些结构性联系。因此，只有立足于依附国家自身的动力才能从政治科学的角度理解“事件的过程”。

我们还通过分析在飞地条件和国家控制出口体系条件下产生的国家间基本结构的差异，揭示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如何给各国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但是，在最后几个章节中，我们回到了依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构条件这一主题，并概括了随着依附工业经济形成而出现的、迄今仍然存在的各种矛盾的特点，比如地区现代工业体系的生产组织与国家整体经济体系的矛盾，社会集团和阶级关系间的矛盾以及它们与国家的矛盾。

我们试图通过这些努力来展示经济体系与政治进程之间的相对自主、相互矛盾和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要理解拉美工业化和依附国家当前的形势，必须分析所谓“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效应，这一表述反映了国际垄断生产集团对依附国家经济体系的控制日益增强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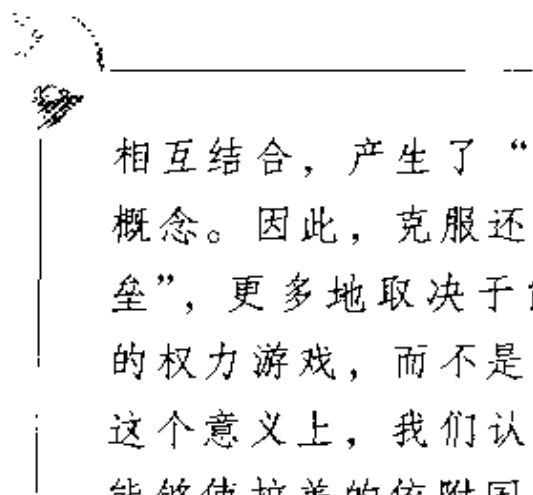
我们所提观点的新意并不在于要承认存在着外国统治这一显而易见的过程，而在于要了解这一统治的形式，并指出这种依附关系与过去的不同之处和对国家和阶级所产生的不同效应。我们强调当前的依附性发展形势不仅超越了发展和依附之间的传统对立（这促进了发展并重新确立和维持了依附关系），而且还从政治上支持了一种联盟体系（这种体系与过去那种维护国外霸权的联盟体系是不同的）。出口商利益高于国内市场的共同利益的时代已经过去，农业利益对城市利益实行经济控制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相反，当前依附形势的特点是“外国利益”日益扎根于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



(但并不破坏过去的统治方式)，进而在城市民众所支持的政治联盟中站稳了脚跟。另一方面，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形成的工业经济，最大限度地淡化了典型殖民主义开发的特点，并谋求赢得统治阶级以及所有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有关的社会集团（比如工薪阶层、技术阶层、企业家和官僚等）的支持。

我们还描述了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它们在试图形成和巩固国内市场和民族经济的时期是两大政治主题，但在依附的新特点中失去而后又重新确立了其实质内容。

最后，我们在分析了各种转型之后，又试图探讨依附概念到底能走多远，或相反，什么时候应该以不依附取而代之。为此，我们再次结合政治条件分析了特定的结构条件，并指出在解释统治状况时，必须考虑到权力利益以及使国内外集团和阶级霸权得以维持的政治联盟，因为统治状况并不仅仅是经济体系导致的社会分工所产生的结果。可以肯定，依附国家的“市场开放”，依附经济无法占领发达国家的市场，新的国外资本通过高科技形式日益扩大对依附经济的参与，以及成熟经济比相对落后的经济更易产生先进技术这些要素构成了经济依附情况的基本结构框架。而这些结构条件与决定各社会集团间关系的政治利益、思想意识和法律形式



相互结合，产生了“依附社会中的工业经济”这一概念。因此，克服还是保持发展和依附的“结构壁垒”，更多地取决于能灵活运用具体“经济条件”的权力游戏，而不是取决于这些经济条件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现实和潜在反对派的存在，能够使拉美的依附国家和工业化国家获得活力，并为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出现创造条件。

我们知道，尽管所具备的条件界定了历史的具体轨迹，但这些轨迹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那些为达到可行的历史目标而抗争的人们的勇敢行为。因此，我们没有对未来事件及其可能的过程作理论上的空想。因为未来不取决于理论上的预测，而取决于能将结构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中的可行性的、建立在共同政治愿望基础上的一致行动。